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August 2021 第七期

| 時事評論 |

2021年以巴衝突：衝突原因與國際回應 崔進揆

日本對中政策的變化：重新回到清晰地制衡戰略？ 王宏仁

清晰的模糊戰略——文在寅政權的兩難 盧信吉

| 研究論文 |

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和海權擴張問題之研究：海上絲路和軍力建設 董慧明

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模式與特色之研究 趙文志、許家榛

中國因應人口結構轉變之政策分析：以推動港澳臺居住證為例 蔡承翰



東海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unghai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August 2021 第七期】



東海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unghai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發刊辭

現代的政治及經濟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呈現劇烈的變化，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景況及困境；此時，溝通平台的建立變得更加重要，我們希望能藉著期刊的建立，提供一個園地供學者們闡述其不同的理念與想法，也讓我們的讀者能了解區域環境的變化及其重要的議題。這次由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及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便是希望能透過論文的發表形式，為學者提供一個有效的交流平台，我們更期許它能成為台灣重要的發聲管道，為學術奠定基石，並有深遠的影響。

隨著網路科技進步，生活的環境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資訊的傳播與人際之間的關係連結，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在各自分工的領域上，也愈來愈精細。然而政治經濟的課題變動也顯得更加快速，新興的議題不斷湧現，亟需專家學者提出看法及因應之道。然而有些議題是以前少見到的，像負利率的出現、人工智慧的大量應用及人口老化的問題等等。更加上積弊已久的沈痾，像資本的過度集中、貧富不均的問題急速惡化、



國際間的貿易對壘嚴重，皆是刻不容緩的，且需要有智慧的處理。因此如何營造出一個公平效率又有正義的社會，為學者無法逃避的責任，我們期許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也盼望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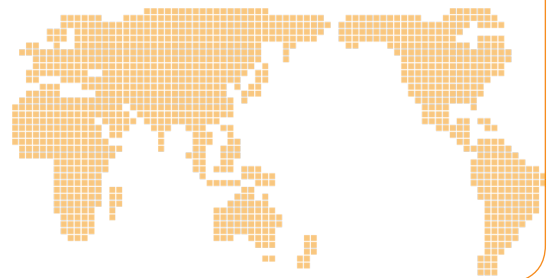
陳文典

2019.04.25

主編的話

美國總統拜登在六月展開了歐洲的訪問行程，包括 G7、NATO、歐盟領袖，甚至在瑞士安排了和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會談。這次的出訪，被視為拜登就任以來，實踐美國重回世界，以及履行多邊主義的決心。而在差不多的時間裡，中俄也舉行了峰會，加上先前中德法的三方領導人視訊會議，透露出了美中競爭的過程中，各自拉攏或爭取同盟夥伴的意圖。在拜登重回多邊主義的戰略視角下，全球呈現美中對抗的格局，而不同地區的中型、區域強權，其影響力將更加重要。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歐盟、俄羅斯、印度、日本等國家，任何的外交決策都可能牽動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在此趨勢下，台灣與台海的和平，也將間接受到美歐中、甚至美俄中等多邊關係的牽動。

在變化迅速且複雜的國際政治發展趨勢下，本刊維持多元的視角，提供給讀者不同地區、不同主題的分析。在這一期第七期的《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中，收錄了三篇的時事評論以及三篇學術論文。中興大學崔進揆副教授，以〈2021 年以巴衝突：衝突原因與國際回應〉為題，分析了以巴地區近期升高衝突的原因。崔教授從歷史的角度，以及各方



的回應，指出儘管國際各方都希望以巴和平解決其間的衝突，但短時間內恐怕仍難以見到和平的曙光。成功大學王宏仁副教授，以〈日本對中政策的變化：重新回到清晰地制衡戰略？〉為題，探討東北亞地區中，日本的對中政策以及影響。王教授從避險的觀點，加上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解釋日本對中政策的形成過程，提醒我們外交決策仍須從本國利益以及國內政治的角力來分析，以免過度誤判。第三篇是中興大學盧信吉助理教授，以〈清晰的模糊戰略：文在寅政權的兩難〉，同樣是聚焦在東北亞地區，分析南韓的外交決策。盧教授從韓半島的無核化談判和進展，加上南韓的選舉競爭，分析韓半島發展的走向。一樣是從國際與國內政治交互影響下，來分析南韓的外交決策。盧教授最後提到，長期以來「內部清晰、但對外立場模糊的策略將不再適用，文在寅將更為直接面對美中競爭格局下的外交壓力」，點出了美中競爭下，各區域國家或多或少都面臨了「選邊站」的壓力。

在三篇學術論文中，國防大學的董慧明副教授，在〈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和海權擴張問題之研究：海上絲路 and 軍力建設〉一文中，分析了中國海上軍力建設的近況。董教授指出，從一帶一路的格局下，無論是南海或是北印度洋，對中國而言，都是利用海上絲路謀取發展而必須捍衛的核心利益，解放軍海軍軍力建設因此至為關鍵。中正大學的趙文志教授與許家榛研究生，分析了〈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模式與特色之研究〉，討論中國大陸對台灣年輕人進行統戰的特點，包括有：培養光榮感、讓利與誘因、生根中國大陸以及手段方式的權變，這些均顯示中國大陸統戰工作的靈活性與彈性。第三篇論文，是目前任職

東吳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的蔡承翰博士所撰寫的〈中國因應人口結構轉變之政策分析：以推動港澳臺居住證為例〉。在這篇文章中，蔡博士以中國各省的資料來分析，在控制其他變數後發現，當國家的 15-64 歲工作人口逐漸增加時，對國家經濟產值有正面貢獻。而人力資本愈多也可以促進經濟表現。而撫養比愈高，對各省經濟表現則有負面影響。這是一篇偏向國內社會與政治發展的研究論文。

國際政治處於一個變動的時局，而台灣處在深受國際政治牽動與影響的樞紐位置。無論是美中台關係，或是亞太地區的研究，甚至是歐洲地區的發展變化，都值得我們持續給予關注。本期的三篇時評，三篇論文，各自呈現作者的觀點，不代表本刊和協會的立場，本刊提供一個意見與研究發表的平台，希望各界同好繼續給予支持。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沈有忠

2021.08.06

“ 本期目錄 ”

發刊辭 / I
主編的話 / III

| 時事評論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 2021 年以巴衝突：衝突原因與國際回應
The 2021 Israel-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崔進揆 /03
Chin-Kuei Tsui
- ▶ 日本對中政策的變化：重新回到清晰地制衡戰略？
Japan's China Policy Change: A Return to a Lucid Hedging Strategy?
王宏仁 /09
Hung-jen Wang
- ▶ 清晰的模糊戰略——文在寅政權的兩難
Dilemma of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The Paradox of Strategic Ambiguity
盧信吉 /15
Lu Hsin Chi

| 研究論文 | Articles

- ▶ 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和海權擴張問題之研究：
海上絲路和軍力建設
A Study on the PRC's National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Seapower Expansion after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Military Power Construction
董慧明 /23
Tung, Hui-Ming
- ▶ 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模式與特色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toward Taiwan's Young People
趙文志、許家榛 /55
Wen-Chih Chao, Chai-Zheng Hsu
- ▶ 中國因應人口結構轉變之政策分析：
以推動港澳臺居住證為例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China's Resident Certificate Policy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xample
蔡承翰 /77
Cheng-Han Tsai

協會簡介 / 97
徵稿啓事 / 99



|| 時事評論 ||

2021 年以巴衝突：衝突原因與國際回應^{*}

The 2021 Israel-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崔進揆^{**}

Chin-Kuei Tsu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8 第七期，頁 3-8。

** 崔進揆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

2021年5月以色列與哈馬斯（Hamas）在巴勒斯坦加薩地區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事件造成至少200名巴勒斯坦人和12名以色列公民喪生。在十多天的衝突中，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出了至少4,000枚火箭彈，以色列方面除了啟動鐵穹（Iron Dome）防禦系統攔截火箭彈外，更以精良的武器對哈馬斯展開報復攻擊。以色列與哈馬斯最終在埃及調停和美國施壓下，議定在5月21日凌晨2點，同步展開停火，為衝突設下停損點。此次以巴衝突的導火線是以色列的屯墾政策，以及發生於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以色列稱聖殿山（Temple Mount）地區的警民衝突。巴勒斯坦人和哈馬斯對以色列自四月中旬起強制執行法院裁定，要求謝赫賈拉（Sheikh Jarrah）地區六戶巴勒斯坦居民撤離，讓猶太新住民進住的決策深感不滿，群情激憤之下終演變為大規模的暴力事件。事實上，以色列的屯墾政策長期以來就讓許多巴勒斯坦人憤恨不平，因為聯合國安理會曾在2016年通過第2334號決議案，決議認定以色列軍事佔領屯墾區的政策違反國際法，因此並無法律效力，故要求以色列必須停止相關活動，遵守日內瓦四公約中佔領國應盡的義務。然，以色列迄今未執行決議，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和以色列的屯墾政策屢屢都是以巴衝突的根本原因。

以巴衝突的歷史原由

以巴衝突的歷史非常悠久，近代可以追溯至二戰時期，以及二戰後聯合國所通過的第181號決議案，該決議案又稱「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同意讓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各自建立自己的國家。以色列在1948年依照決議案獨立建國，5月14日是以色列的國慶，但5月15日被巴勒斯坦人視為是民族苦難日（Nakba Day）。因為就在以色列建國的同時，許多巴勒斯坦人卻也被迫必須離開自己的家園，甚至成為居無定所的難民。長期以來，巴勒斯坦人一直依賴區域內的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進行談判，歷史上阿拉伯國家曾和以色列進行過

至少五次的大型戰爭，包括：1948 年的獨立戰爭、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1967 年的六日戰爭、1973 年的贖罪日戰爭、1982 年的黎南戰爭。以色列在過去幾場重大的戰爭中大幅擴張領土，現今實際控制的領土範圍已遠超過當初聯合國決議所承諾允許讓猶太人建國的領土，其中亦包含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對於巴勒斯坦問題，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並非不願意和以色列和談，但是要求以色列必須先遵守聯合國相關決議，且未來的巴勒斯坦國領土必須是 1967 年六日戰爭前的領土界線，巴勒斯坦人的訴求亦為許多的阿拉伯國家所認同。

1964 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在埃及舉行的阿拉伯國家峰會上創立，該組織被視為是巴勒斯坦人在國際社會中的合法代表，而巴勒斯坦著名的精神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就是 PLO 最大派系法塔（Fatah）的領導人。阿拉法特帶領的 PLO 在 1960、1970、1980 年代以游擊戰和武裝抗爭的方式對抗以色列，但是該組織在 1990 年代修正路線，主張與以色列透過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並實踐聯合國的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PLO 在 1993 年和以色列達成協議，相互承認彼此，並簽署《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以色列同意逐步交還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行政管轄權予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 PA），阿拉法特被推選為 PA 的第一任總統。但是 2000 年 9 月夏隆（Ariel Sharon）強勢造訪阿克薩清真寺的事件激化了以巴雙方的衝突，夏隆在隔年 3 月當選總理後，採取強硬手段處理巴勒斯坦問題，以巴和平進程因此中斷。

PA 在 2006 年舉行自治選舉，巴勒斯坦另一武裝勢力團體哈馬斯在選舉中獲得勝選，挑戰了 PLO 長期主導的政治勢力。成立於 1987 年的哈馬斯主張以武裝抗爭的方式對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更堅持不可放棄巴勒斯坦的任何領土。哈馬斯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激進主張，以及敵視以色列的態度與立場，使得以色列、美國和多數歐盟國家將其定義為是所謂的恐怖主義團體，亦不承認該一組織在 2006 年的勝選結果。哈馬斯和 PA 的衝突在 2006 年的選舉後加劇，並演變成巴勒斯坦陣營內部的權力鬥爭。自 2007 年起，哈馬斯實際控制加薩地區，而阿巴斯（Mahmoud Abbas）領導的 PA 則控制約旦河西岸，雙方於 2012 年在埃及的調停下達成和解，同意由阿巴斯擔任暫時政府（interim government）的

總統，但是今日巴勒斯坦的政治現況仍是哈馬斯控制加薩，PA 控制約旦河西岸。2014 年以色列對加薩地區的哈馬斯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掃蕩，在為期七週的行動中 2,200 多名的巴勒斯坦人喪生，其中多半是平民，以色列則有 67 名士兵和 6 名平民被殺。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l Criminal Court, ICC）在 2021 年針對 2014 年的衝突對以色列和哈馬斯可能在衝突中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調查，並向雙方警告可能也會對近日的衝突進行調查工作。

國際社會反應與各方立場

以巴之間五月的衝突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主要大國的態度亦受到各方注意，各方盼聯合國安理會能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來處理此次的以巴衝突。拜登政府主張以色列有權針對哈馬斯的攻擊採取自我防衛的行動，並至少三度在聯合國表態反對針對該一情勢進行緊急處置的討論。事實上，拜登政府承受來自國內外許多的壓力。拜登政府就任後多次對外提倡人權普世價值，並表示各國皆應予以尊重，因此過度偏袒以色列會遭到漠視巴勒斯坦人權的指責，而民主黨內部也有強勢的意見希望拜登政府能夠積極作為，要求以巴雙方停火。此外，美國國內很快又將面臨期中的選舉，猶太勢力在美國國內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國會中更有所謂的猶太遊說團體，猶太團體的影響力在選舉中不容忽視。拜登政府雖然否決了聯合國的討論議案，但總統本人私下卻多次致電給以巴雙方的領導人，盼雙方克制，足見拜登政府的謹慎。相較於美國，2021 年 5 月正值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的輪值主席，面對美國多次阻撓安理會通過針對以巴情勢的緊急聲明，中國外長王毅主張美國應該「承擔起其責任，採取公正立場」，並表示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支持兩國方案，希望以巴雙方透過談判來實踐以 1967 年國界為基礎的巴勒斯坦建國計畫。俄羅斯總統普丁則表示，以巴的緊張情勢已嚴重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俄羅斯亦表示美國、歐盟、俄羅斯、聯合國四方應該儘快針對區域情勢召開緊急會議，進行實質的討論。另，歐盟國家（除匈牙利外）在 5 月 18 日召開的外長會議中曾發表共同聲明，支持以色列有權採取自我防衛的行動，但是行動必須符合比例原則，遵守國際人道法，並避免對於婦女、孩童和平民的侵

害，呼籲以巴雙方應立即停火。法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對於以巴衝突最積極表態的國家，明確主張安理會應該做出決議。此次的以巴衝突最終在埃及的積極斡旋，美國的強烈關切，以及主要大國的壓力下讓衝突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緩和了為期十多天的緊張情勢。

結語

以巴衝突的由來已久，主因在於巴勒斯坦建國、領土劃分、難民返鄉、猶太屯墾等核心問題。此外，川普主政下的美國政府曾做出幾個具高度爭議性的決策，對以巴問題和中東區域情勢發展影響深遠。首先，川普政府打破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政府的慣例，將美國駐以色列的大使館由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此舉令巴勒斯坦和許多阿拉伯國家不滿，因為該城的宗教敏感度非常高，是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三大聖城，美國的決定等同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國都。其次，美國國務院和國務卿龐佩奧亦曾公開表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屯墾作為不違反國際法，以及承認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的主權。對於巴勒斯坦人和許多阿拉伯國家而言，以色列對於前述土地的取得是存有爭議的，同時聯合國安理會曾在 2016 年通過第 2334 號決議案，明確表示以色列軍事佔領屯墾區不符合國際法。美國政府對於以巴衝突核心問題的表態，明顯偏袒以色列，這也讓巴勒斯坦人和區域內的阿拉伯國家懷疑美國在以巴問題上的公正立場，不利於日後以巴衝突的調解和中東秩序的維持。考量猶太勢力對於美國政治和選舉的影響力，拜登上任後對於前任者川普的政策很難進行根本性的轉變，雖在華盛頓郵報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命案的調查和沙烏地阿拉伯介入葉門內戰引發的人權議題提出嚴正的譴責和批評，但是此次處理以巴衝突和以色列漠視巴勒斯坦人居住權和生存權的表現，恐怕會讓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國家對拜登政府不敢寄予太多的期待。最後，為了能夠落實兩國方案，順利推動巴勒斯坦國的建立，哈馬斯組織未來必須進行路線的調整和內部意見的整合，使用暴力和激進手段訴求理念，不僅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更可能加深外界對於該一組織團體的誤解，認定該組織就是極端恐怖主義團體，讓以巴和平和巴勒斯坦建國的

願景更難實踐。

日本對中政策的變化：重新回到清晰地制衡戰略？*

Japan's China Policy Change: A Return to a Lucid Hedging Strategy?

王宏仁**

Hung-jen Wang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8 第七期，頁 9-14。

** 王宏仁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在國際關係理論觀察家的眼中，日本如同很多區域中的中小型國家一樣，時時面對來自不同大國的壓力或是威脅，因此造就出此種類型的國家在面對這些壓力或是威脅時，會採取一個較為長期的、模糊的交往立場。這個長期的、模糊的交往立場是幫助像是日本這樣的中型國家可以在大國之間的壓力之下求得生存，而不需要完全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避險政策。避險政策其實是從傳統的現實主義觀點與邏輯所延伸出來的一種觀察視角。因為在國家追求避險政策的時候，其選擇性是被限制在制衡（balancing）與扈從（bandwagoning）之間，而這基本上是顯示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權力對抗或是權力結盟的方式是如何排列組合的問題。若以此觀點來評估日本長期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似乎正可以說明在歷史上為何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時好時壞，而與美國的關係也不見得永遠如此順暢，關鍵在於，日本作為一個夾在兩大國—中國、美國—之間的區域中型國家，有必須同時討好中國與美國的壓力，但也有同時必須防範中國的威脅或是擔憂美國盟友減少對其安全保障承諾的壓力。不過，從日本新政府菅義偉上台之後與美國在安全議題上的合作程度上來看，似乎日本已經從原本模糊的避險戰略本質，轉向越為清晰地抗中制衡策略。這是否代表日本對中政策已經產生出至少中短期根本性地變化呢？換言之，日本已經在扈從美國、抗衡中國的立場上做出確認呢？

首先，根據一些觀察發現到，日本在對中政策的立場上從至少 1990 年以來都是採取相當一致的制衡策略，差別只在於強度的問題（Koga, 2018）。這也就是 Jeffrey Horung（2014）所認為的，日本在對中政策的立場上向來不是要去改變中國，而是消極地做出防禦、避免利益折損。因此，日本在 1972 年與 1996 年間被視為是採取與中國的交往政策，但是在 1996 年之後到 2010 年開始進行軟避險策略（soft hedging），即，最低限度地與其他區域內國家包含印度合作，以間接制衡中國的勢力威脅。2010 年之後的日本則是增加力道，變成硬避險（hard hedging），亦即，日本同時增強自身和外部制衡中國威脅的能力。所以我們看到日本首相菅義偉上台之後似乎也是逐漸加強對中國的制衡策略，包含，在 2020 年 9 月就任沒多久便至越南、印尼兩國進行國是訪問，增強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可被視為某種間接地對中軟避險策略。爾後菅義偉政府即使在國內疫情尚未控制得宜的時間點，仍與美國、印度、澳洲等國領導人進行軍事味道

濃厚的四方會談（QUAD），以及之後的日美 2+2 會議、訪美峰會、新版日美聯合聲明等等，都在在顯示日本開始硬避險的戰略抉擇。

不過，日本當前的政策作為不該視為是憑空而來或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主要的原因在於，傳統避險理論的成立有其侷限性，導致於無法真正有效地在解釋上涵蓋變化莫測的經驗世界，以及國家領導人在決策選擇上的空間。例如，傳統避險理論要求像是日本這樣的國家，只能在制衡或是扈從之間做出游移選擇，但是前者是建立在對大國的挑釁上，後者則是建立在自我自主性被控制的風險上。這兩種理論假設對於日本來說，都不會是好的選項。日本雖然因為地緣政治的結構因素而對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特別敏感，但是在中、日之間已經形成的緊密經貿關係而言，日本沒有理由要主動挑釁中國。同樣地，二戰戰敗的歷史遠因導致日本的國家自主性長期操控在美國手上，因而讓日本菁英階級很早就認知到必須改變日本這種「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窘境（Pyle, 1982）。換言之，就算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很一貫地在兩大國之間採取避險策略，但是日本如何實踐此戰略目標卻是仰賴決策者視當下的情況而做出調整，並非一種命定的結果。因此，一種所謂日本戰術式的避險策略（tactical hedging）（Koga, 2020）被提出：這是一種短期的、模糊的、宣示性的政策原則，用來測試當下現狀政策的有效性與否，以用來決定是否有需要在未來改變策略的一種戰術。是一種高度靈活的外交手段，很適合用在日本於其他共同追求開放與自由印太區域秩序的國家。這裡幫助我們了解的是，日本對中國或是對大國的政策在時間向度的設計上偏好採取以短時效的觀察、累積、測試，來進一步修正長時間的戰略目標，因此這個避險政策形成一種動態與進化的過程，未來目標也無法事先預測。此外，由於在追求合作的立場上是採取模糊的宣示，因此並沒有排除與中國進行合作的可能。這兩個因素加起來導致日本的對中、美兩國的避險政策現今看起來是傾向於對中進行制衡或對美進行依賴，但很可能下一步又會與中合作、降低美國的掣肘。例如我們在過去歷史中看到，當美國開始考慮減少對於亞洲事務的安全保障或是要求日本等同盟國家增加對於安全責任的自我負擔的時候，日本會開始進行所謂的安全避險策略（security hedging），也就是開始考慮如何可以解除對於集體自衛權的使用時機（Koga, 2018）。即便現今我們看到日、美在區域安全的合作上又因為美國新

任總統拜登的承諾而加強，但由於彼此之間的信任感是建立在各自的國家利益之上，日本不是沒有對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有所懷疑的。所以這種出於提早對於安全資本不足的擔憂，已經反映在最近日本領導階層的公開談話當中，特別是有意無意地針對日本集體自衛權定義上的鬆綁做出評論（陳民峰報導，2021）。

日本政府當前在對中政策上所面臨的另一項限制是來自於現實環境的挑戰。首先，日本國會的改選大概會在東京奧運落幕之後的九月舉行。以菅義偉內閣團隊目前的民調來看，普遍的支持度是下滑、不滿意度是提升的。¹而就下一屆選民心中理想的首相候選人而言，菅義偉絕對不是排在第一位（Nikkei, 2021）。當然，了解日本政治運作的人都知道，日本首相的任命受到派系運作的影響甚鉅，這與候選人在一般日本選民心中的民調高低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但是，一國的外交政策向來不會只有受到國際情勢的因素所影響，國內施政治理的表現往往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並不會是例外。此外，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建立與發展，還涉及到兩國之間在經貿、文化、教育、體育、環境變遷、歷史問題等層面的依賴、需求或影響程度而定。這也就導致本文最早所提及的避險理論在套用在各個不同的案例或是國家身上的時候，需要做出不同的修正（Haacke, 2019）。當日本在軍事安全的政策上選擇靠攏美國、對抗中國，並不代表日本在其他領域的行為都必須如此。這裡的前提是要打破軍事安全完全主導一國外交行為的看法。首先，國內政治對於 9 月國會選舉後的日本對外政策、對中政策會不會有影響？其次，如果自民黨繼續執政，黨內例如二階俊博等長期對於中國友好的支持聲音會不會對於日本政府過於反中的政策給予壓力和提出修正？根據 2021 年 4 月日經新聞的報導，日本對中國的出口比例已經創下 10 年來新高，並且超越美國。²這種日本和中國之間持續高度經貿依賴的情況，是否會削弱日本在軍事安全層面上意欲制衡中國的力道？事實上，從近期所發展出的關係平衡理論來看，日本很有可能因為在某一方面與中國的關係緊張或是破裂，找機會在別的關係層面予以補償，除非日、中之間某一方已經完全放棄任何關係的建立（Shih et al., 2019）。

1 NHK 報導，參見 <https://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2021/07/09。

2 參閱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44471-2021-04-20-05-00-25.html?start=0>。2021/07/09。

結語

日本的對外政策、對中政策或是對大國的政策，向來是在某種一致性的道路上進行不斷的中、短期修正。國際結構（例如，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明顯物質實力的消長）雖然限制住日本可能有的戰略選項，但是日本在面對大國之間所做出的避險策略絕對不會是命定的。即便是在結構層次上，大環境所提供的認知條件是否足夠並清楚到能讓日本做出理性的抉擇，在經驗世界中實屬不易。此外，關鍵大國例如美國對日本安全承諾的轉變、或是中國某種程度的耐心，都很容易改變日本的政策策略。由於避險型態的方式多樣、涉及的議題多元，即便避險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日本在某些時刻的行為，但是日本自身國內的政治形態、與大國之間的不同關係發展，勢必要納入考量，以避免吾人對於日本外交政策的錯誤判斷。

參考文獻

- Shih, Chih-yu, et al. (201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ornung, Jeffrey W. (2014). "Japan's Growing Hard Hedge against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 10, No. 2: 649-669.
- Haacke, Jurgen (2019).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for a Modifi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 3: 375-417.
- Koga, Kei (2018).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633-660.
- Koga, Kei (2020). "Japan's 'Indo-Pacific' Question: Countering China or Shaping a New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49-73.
- Pyle, Kenneth B. (1982). "The Future of Japanese Nationality: An Essay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8, No. 2: 223-263.

陳民峰報導（2021）。〈日本稱中國若攻台美日將共同防禦台灣回應樂見國際關注台海和平〉，《法國廣播電台》，7月6日。https://www.rfi.fr/tw/%E4%BA%9E%E6%B4%B2/20210706-%E6%97%A5%E6%9C%AC%E7%A8%B1%E4%B8%AD%E5%9C%8B%E8%8B%A5%E6%94%BB%E5%8F%B0%E7%BE%8E%E6%97%A5%E5%B0%87%E5%85%B1%E5%90%8C%E9%98%B2%E8%A1%9B%E5%8F%B0%E7%81%A3%E5%9B%9E%E6%87%89%E6%A8%82%E8%A6%8B%E5%9C%8B%E9%9A%9B%E9%97%9C%E6%B3%A8%E5%8F%B0%E6%B5%B7%E5%92%8C%E5%B9%B3。2021/07/09。

清晰的模糊戰略——文在寅政權的兩難^{*}

Dilemma of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The Paradox of Strategic Ambiguity

盧信吉^{**}

Lu Hsin Ch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8 第七期，頁 15-19。

** 盧信吉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2021年四月初的地方選舉，文在寅總統領導的執政黨大敗。青瓦台被迫讓部分政府官員去職，以及政黨領導階層全部改組，執政團隊努力扭轉其政策方針。與過去相比最大的差異在於，文政權執政初期以「改革」為重心，主要用人風格為政治家以及學界教授，然而不聞政策執行與落實的結果，就是淪為政策空談理想與願景；後期執政以「穩定」為主軸的施政方向，期望讓政策落實能夠重獲選民信賴。只是相對於內在局勢的轉趨保守，文政權面臨的地緣結構卻轉趨變動。隨著美國川普政權任期的結束，文在寅政權在亞太地區開始失去扮演關鍵國家行為者的角色與地位。外交上，拜登政權的戰略對象重新擺置到中國，讓過去透過美國川普政權與北韓金氏政權友善對話的契機不再，文在寅政權喪失東北亞區域話語權。更可見拜登政權上台後，從美日 2+2 會議安排先於美韓 2+2，到美日高峰會的時程亦先於美韓高峰會，顯示韓國地位在拜登政權亞太盟國的選擇順位中逐漸降低。內外兼失的政治局面，讓青瓦臺在戰略選擇陷入了兩難的困境。

然而，文在寅總統於四月底「配合中國」線上出席「博鰲論壇」時，認同習近平的「求同存異」精神與給予高度評價，卻又清楚說明其外交態度。據此判斷未來韓國在未受到美國支持下可能的外交立場，證明文在寅政權對於當前外交變局的回應。青瓦臺仍然在美中競爭舞台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面臨選舉壓力的執政黨卻對美中兩國戰略選擇上兼有期許。如何呈現清晰的戰略選項，完成對國際層次以及國內層次的模糊應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壹、當前東北亞局勢之觀察及影響

一、美國對日關係優先於對韓關係 vs. 韓國對中關係優先於對美關係

與過去美國亞太戰略中日韓兩國的平等地位相比，拜登政權若有似無地將日本的地位提昇於韓國之前。除了相關會議時程的排序，韓國都落後於日本之外，更因為韓國對於「中國」的態度「不明確」更顯突兀。如近期美韓 2+2 聯合聲明中雖然配合韓國需求並未特別針對中國議題發聲，卻與多項美國對外聲明態度、方向不一致，而美韓峰會的舉辦時程較美日峰會延後將近一個月時間，都是美國

當前東北亞政策調整的相關跡證。

然而從韓國角度檢視當前局勢發展，並非韓國有意疏遠美國，而是過去川普政權延續下的美國亞太政策，未能實際符合文在寅政權需求所致：包含有美軍駐韓費用未來五年協定雖然已協商完成，但本年度調升 13.9%，已是將近 20 年來韓國分攤駐軍費用最大幅度的年度調升，與韓國人民對其國際地位提升的認知不符；其二，文政權需要更進一步扮演「對北關係」友善發展的關鍵地位，在美國重新轉向回歸「戰略忍耐」的方針後，韓國可能需要中國協助才能重新與金氏政權進行「對話」。這樣的「對北需求」將迫使韓國在當前發展下，擬與美國保持相對距離。

二、加入 Quad (Quad +) vs. 維繫最大貿易國

為回應美國拜登政權需求，當前東北亞國家最為明確的政策回應，是美國、日本、印度、澳洲所共同建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he Quad），其針對共有的價值以及討論包括南海及東海免於脅迫的航行自由、北韓核武問題、緬甸政變與暴力鎮壓，與專制與民主模式競爭…等，都讓美國對於重新建構與盟邦關係有更多的信心。然而，遲遲不願意表態的韓國，除了表面上標榜「美中平衡外交」外，實際上卻是不願意正式承認其外交選擇。一度列入討論的政策目標中，把「Quad」甚至是加入韓國、紐西蘭、越南的「Quad+」發展成東北亞版的北約組織（NATO），都會讓韓國陷入一段脫離對中國貿易的混亂陣痛期。基於國家實際利益的考量，韓國需要消極面對國際壓力，且審慎評估戰略選擇。但其模糊應對的外交政策，代表著文政權考量其內部對於現狀的需求。文政權在不願意變動最大貿易國對本國六百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下，需要顧及中國的外交需求，避免改變當前韓國對中國經濟倚賴的格局，進而可能連帶失去選民的信心，讓文政權加速崩解。

當前拜登政權尚且容忍韓國在經濟壓力下，遊走於戰略模糊的需求。在未來逐步統整民主盟國與傳統美國盟邦後，將逐次加強韓國表態的可能，諸如美韓 2+2 峰會前，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Jacob Jeremiah Sullivan）與美國前聯邦議員以及智庫，要求韓國加入四方安全會談的傳聞不絕於耳；六月底前總統彭斯

(Michael Richard "Mike" Pence) 也意有所指的表示，韓國應該加入 Quad。「外交表態」與「經濟利益選邊」將成為當前美中競逐下的必要承諾，也是能否進入美中兩方陣營並從中獲益的必備條件。

貳、影響未來變動的因素分析

一、半島無核化進程

回歸「對北」以及「半島」議題，韓國另外關注的焦點在於北韓是否願意遵從「半島無核化」的進程，削減核子武器。然而，川普政權混亂的無核化驗證標準，讓半島無核化進程陷入一段時間的混亂，如從「完全、可驗證、不可逆的無核化」(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CVID) 為目標，到 2017 年，美國重新再與北韓政權展開會談時，轉變成「永久、可驗證、不可逆的無核化(設備拆解)」(Permanent,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ing, PVID)，與《美國-北韓新加坡會談》前美國單方面宣稱「完全無核化」(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CD)，再到日前改以「最終、充分驗證的無核化」(Final, Fully Verified Denuclearization, FFVD) 原則作為驗證原則，都無法落實無核化檢驗。另外，根據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與美國蘭德智庫在 4 月 13 日發布《如何應對朝核威脅》的政策評估中，推測未來北韓最多可能可以擁有 151-242 枚核武器，倘若未來發生核戰爭，朝鮮半島將無可挽救，相關發展都可證明半島無核化議題相對於其他情勢發展較為悲觀。即便從過去經驗可以推定，北韓接受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可能性幾乎趨近於零，但文政權仍對兩韓之間的互動模式抱有期待，包含透過當前疫情發展，或可能迫使堅持封鎖國境的金式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讓無核化的選項在民間需求增強後被列入考慮。

二、總統選舉導致外交政策轉向

首爾、釜山市長選舉後，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跌至新低，也讓文政權是否維持現有內政外交政策增添變數。主要原因在於共同民主黨過去除了受

到疫情起伏影響以外，其主打「對北政策」——以和平方式尋求朝鮮半島發展、倡議建立半島和平機制，以及發展半島經濟地圖為口號，在總統選舉中獲得多數民眾支持進而入主青瓦臺。民眾對於文政權對北政策的忍受程度在 2020 年後逐步不耐，也是影響本次選舉中的關鍵（其他尚有候選人性騷擾問題、房貸問題以及疫情管控等多項因素）。雖然目前對北政策尚未發酵，但明年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可能會促使文政權為了所屬政黨的勝利而改變韓國外交政策，是否能夠在不激怒北韓領導集團的情況下避免雙方衝突，這是本次地方選舉後必須再次審慎思考之處。

代結語：明確「以靜待變」的韓國戰略模糊政策

韓國針對當前東北亞情勢判斷時，雖然採取模糊形式以對，不願意直接表態，但相較於美國對於日本的友好，包含透過與日本合作以遏止中國勢力對外延伸，以及美國優先採取較為溫和的外交交涉手段，韓國顯然較為願意配合中國，如博鰲論壇中對於習近平相關言論的認同，除了代價較小以外，韓國仍然期待透過模糊的選擇，換取中美兩國的政策中韓國生存空間的存在與擴大。例如回到過去半島議題中，韓國能夠掌握對北韓信息的轉譯角色，亦或是在北韓對外尋求援助的信息傳遞者。韓國或許期待未來美國無法與北韓領導人對話時，再扮演關鍵角色，或者取代日本成為北韓政權經濟援助的主要供應角色後，再次具備影響東北亞區域發展的關鍵。不論如何變化，韓國都期許自己能夠成為東北亞局勢轉變的關鍵角色，加入哪方陣營都能直接帶給其他盟國勝利。只是韓國戰略模糊的困境，在未來可能將接受更嚴峻的挑戰。例如美國於 2+2 會議中願意配合韓國需求調整聯合宣言內容，但接續的美韓峰會後，韓國就被迫針對「台海議題」表態，日後一旦韓國面對更多壓力，需要做出更多相關回應，或者讓美中兩大國認為其選擇支持某國政策後，將會再次調整其政策，以回應韓國的選擇。這時候，內部「清晰」但對外立場「模糊」的策略將不再適用，文政權將更為直接面對美中競爭格局下的外交壓力。



|| 研究論文 ||

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和海權擴張 問題之研究：海上絲路 and 軍力建設^{*}

A Study on the PRC's National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Seapower Expansion after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Military Power Construction

董慧明^{**}

Tung, Hui-Ming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8 第七期，頁 23-54。

** 董慧明為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最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其中，於 2013 年 10 月 3 日提出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包含中國至南太平洋，以及經由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兩條重要航路，影響所及不僅包括福州、三亞等沿海港口，在區域安全戰略布局方面，更影響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和歐洲各國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中共為了加速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進程，除了在 2019 年 7 月公布之《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要求海軍部隊「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目標，亦凸顯「海外利益攸關區」概念，對維護其海外利益安全和確保地區安全穩定提出具體設想。

由此可見，當中共極力向全世界行銷「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之際，海軍部隊的建設、轉型也正隨著「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進程，同步強化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這種揉合國家政治經濟總體發展戰略和軍事戰略「柔中帶剛」的作法，已經在無形之中改變中共向來強調「積極防禦」戰略指導思想和作戰原則。當「戰略進攻」的成分正快速超越「戰略防禦」時，儘管中國對外軍力擴張的目的不在攻城掠地，惟為了確保攸關國家利益的利路和國家主權的通路不受阻擋，海軍部隊建設和發展也已不再定格於護衛層次，未來將伴隨航艦戰鬥群逐漸成形而更顯開路的功能。

本研究以「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為背景，以解放軍海軍部隊建設為主軸，析論軍力建設如何支撐國家政治經濟發展，進而實現中共「海洋強國」目標。藉由本研究可對解放軍現代化軍力建設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且提供相關議題研究另一視角。

關鍵字：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強國、海軍、戰略支撐點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軍力持續成長，學、研各方研究的重點，亦開始關注其國家行為 (national behavior) 對本國、周邊、區域和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Cáceres, 2014; Cáceres and Ear, 2013)。例如，從地緣戰略 (geo-strategy) 面向，探討中國如何從一個在傳統認知上被歸類為陸權國 (land power) 的國家，現卻隨著國家經濟影響力、安全利益不斷向境外延伸，進而轉變為一個必須打通陸地及海上發展路線之典型國家案例，且愈來愈具有海權國 (sea power) 的特徵 (孫昌國，2017)。尤其在進入 21 世紀經濟全球化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後，為了確保陸、海交通運輸路線暢達之安全和發展需求，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 (strategic interests) 更是從地圖紙上，具體變為綜合國力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之重要觀察指標，且可以 2013 年 9 月、10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後造訪哈薩克、印尼兩國，提出富含陸權思維之「絲綢之路經濟帶」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以及海權思維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以下簡稱：海上絲路) 作為例證。

這套自中共建政以來首次提出取徑於陸、海通道，目標涵蓋歐亞大陸之戰略構想，後被定調為「一帶一路」倡議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2017)，其海陸並進的國家地緣政治戰略不僅為中共策定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定性，其沿路布局的戰略支撐點 (strategic strong point)，也標定出明確的國力、軍力外擴軌跡。事實上，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陸權、海權國家的行為和能力經常被後人用以檢視不同時期大國的興衰和變遷。儘管論點所見莫衷一是，惟地緣環境和政治、經濟發展之間形成的關聯性已成為研究一個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之重要途徑。其中，探研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和地緣政治間的關係亦是如此，尤其結合其國力發展進程，經由陸路、海路外擴的經濟版圖已遍及全球，因地緣政治關係衍生之軍力戰略支撐議題更顯關鍵。

中共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期間在區域和國際間亦引起褒貶不一的評

價。對中國而言，這項倡議是建立國際交往、合作、競爭的重要基礎，攸關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和發展，亦交織著參與國際事務治理實力的相互較勁，富含國家戰略利益，必須依賴軍力的支持和保障。與此同時，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解放軍）海軍朝向深藍海域擴展，亦映襯出海軍戰略文化已隨之轉變（徐立特，2018：36-45）。2019年7月，中共公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將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列為國防政策重點，並對海軍建軍提出「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其中，「遠海防衛」戰略正在和「長航開路」產生內涵性質（intensive property）的相互滲透，直接影響海上軍力建設的重點和取向。

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在釐清中國國家戰略利益正受到國際地緣政治因素的高度影響，且可以海上絲路戰略作為研究例證。其中，檢視海上絲路發展路徑，尚可發現解放軍海軍軍力正是確保國家戰略利益的樞紐（pivot），不僅是護衛者，更是海上開路先鋒。研究中關注解放軍海軍在支撐海上絲路重要據點和確保海上經貿交通線安全採取的行動舉措，主要考量是認為海上航線，以及為海上運輸服務的港口、水工建築物和各種航行保障設施，已成為中國和世界各國聯繫之重要海洋命脈。這些戰略利益的保存、獲取不僅要有宏觀縝密的計畫作為，更有賴全備可用的兵力資源，方能克竟全功。當海上絲路發展和海軍建設的方向交疊，可以看出中共利用地緣條件向歐陸國家外擴其國家戰略利益之際，解放軍海軍在亞洲、歐洲、非洲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亦日增月益。

貳、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和「海上絲路」戰略意涵

國家戰略利益的核心往往和政治、經濟、安全相關，同時也深受地緣環境影響。因此，從學理上而論，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安全戰略三者之間的關聯性、重要性亦受到各國地理位置、國家憲政制度和國情等因素影響，戰略思維各異。以中國現況而論，在地理環境上已不再自居為陸權國家，且按照「海權論」學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邊緣地帶論」學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的論點，呈現出在歐亞邊緣地帶擴張海權的態勢。中國國家戰略利益

的本質，亦隨著經濟對外貿易和產業轉型發展必須對接西方自由經濟市場的需求快速增加，導致地緣環境相關利益國家產生政治疑慮，進而在趨利避害之現實抉擇中，亦投入捍衛權益的軍事武裝力量建設。

中共將政治、經濟、安全視為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且相互制約的矛盾統一體（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編，2004：123）。自改革開放以來，極為重視以經濟利益為物質基礎的國家戰略利益，在推動「海上絲路」戰略的同時，更是將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緊密鏈結，著重對外的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尤其是遠洋航線的安全與否已經成為其國家戰略利益的重要一環（Wu and You, 2020: 233-235；高慶編，2009：226）。「海上絲路」戰略內含利益、策略和手段的結合運用，當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已延伸至國境之外，也同時指引出海上軍力建設的目標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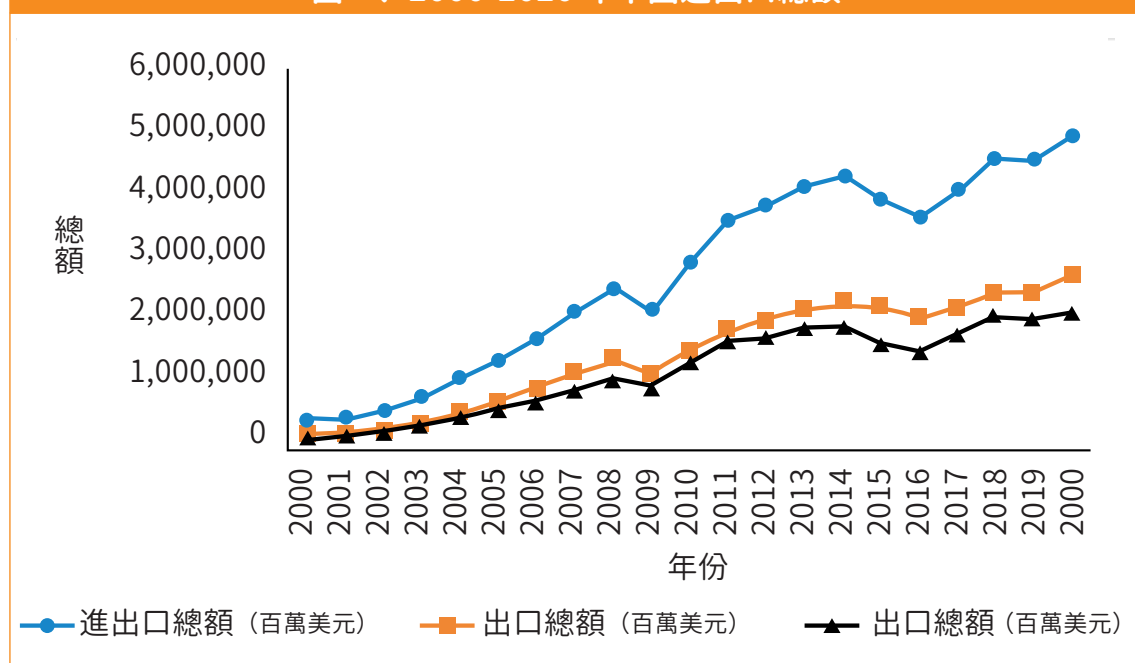
一、以物質利益輸出和輸入為主要體現的國家戰略利益

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而言，無論國土面積大小、實行哪種憲政體制，其國家總體戰略皆包含「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在內之兩種戰略利益考量，且通常伴隨時空環境條件轉變而變化（周碧松，2015：4）。以中共在 1980 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迄今為例，對實體經濟、對外貿易投資等國家利益已從「計畫」到「市場」經濟手段的認知轉變。受到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中共在歷經文革「十年浩劫」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困頓時期後，對於「利益」一詞的詮釋有更多的意義是和有形的物質財富相鏈結。亦即按照馬克思主義對人的利益源於人的需要論點（王浦劬，1995：51），以及在《資本論》中提到實體經濟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楊繼國編，2014：260）、是國家發展的根基等相關論點（國務院研究室編寫組，2017：264-266），中國做為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關係的對外行為和互動模式中，自然重視國家物質利益的策略性獲取。

當前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利益已隨著經濟全球化持續外擴，根據中國海關總署 2019 年 1 月公布對 2018 年全年對外經濟貿易進出口總值發布官方數據資料顯示，除了繼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外，進出口規模亦創新高。其中，出口 2.48 萬億美元，增長 9.9%、進口 2.14 萬億美元，增長 15.8%，貿易順差

3,517.6 億美元，收窄 16.2%。其次，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 1.21 萬億美元，增長 13.3%，高出全國整體增速 3.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成為帶動中國外貿發展的新動力（劉紅霞，2019；中國網，2019）。檢視相關數據變化，可見儘管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問題難解，且潛藏波及全球經濟景氣等疑慮變數，惟若檢視歷年來的進出口貿易量（如圖一所示），仍可發現中國和全球貿易總量仍然保持穩定增長狀態，其物質利益關係亦更加深入密切。

圖一、2000-2020 年中國進出口總額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自行繪製

當前中國國家戰略利益主要體現在：本土向海外、近海向遠洋、空中向太空、有形空間向無形空間，以及傳統領域向非傳統領域等方面（周碧松，2015：6-9）。為了確保海外權益不受損害，中共亦聲稱不採取美國等霸權國家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的作法，而是改用尋求海外「戰略支撐點」，作為解放軍在境外活動的整補據點（Kennedy, 2019）。因此，當中國的海外戰略利益愈增加，循地緣關係建立戰略支撐點的需求亦同步上升。

二、海上絲路戰略意涵

關於海上絲路，一般皆溯及 2013 年 10 月 3 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的演說（張鋒，2017：10）：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路是中共推動海洋強國戰略之具體實踐。¹ 這項在習近平主政後被提出的國家海權戰略，凸顯出中國試圖從東部、南部沿海港口出發，鏈結歷史發展脈絡和物質經濟現實利益，搭起亞洲、非洲和歐洲諸國互聯互通之新橋樑。首先，中共以歷史和海洋文化等軟實力因素做為媒介，將中國和海洋連結，從經濟效益上積極開發海洋資源；從安全效益上維護海上通道；從領土主權維護上，發展海軍硬實力（高蘭，2013：64-68）。其次，從經濟發展布局以觀，海上絲路戰略主要在透過中國和世界經濟的聯繫，對東亞產業分工體系、經濟增長體系進行改造和升級，並藉此強化中國和東亞國家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因此，中共積極尋求和周邊國家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側重港口建設，以及港口和國內產銷通路之連結，也要藉此帶動城市基礎建設的升級換代（趙江林編，2015：186、190）。

2017 年 5 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習近平提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16 字訣（王蕾，2018：2），顯示無論是「一帶」或是「一路」，推動西進和南向，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範圍，構建橫跨全球 60 多國的跨國經濟帶，已成為中共展現國力，實現「中國夢」的良方。

1 海洋強國的戰略於 2012 年 11 月首次在中共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內容是「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

(一) 戰略構想：由海連陸「走出去」（何帆、姚枝仲，2013：244）² 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或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共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規劃要實現沿線國家的「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劉東民、何帆、張春宇，2016：66）。中共設法透過陸地和海洋途徑，以合作開發共同利益方式，提高和周邊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規模（汪戎編，2015：13-14）。2015年3月28日，習近平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亦提到要摒棄零和遊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人民網，2015）。相關論述凸顯中共亟欲建立、主導國際協調，擴大產品、服務、資本、技術、勞動力、管理以及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張力。

此外，海上絲路並非僅按照「一帶一路」倡議地圖，將中國沿海和沿路國家港口串通在一起，更深層的戰略構想是要藉由改建港口基礎建設，以及提高港口貨櫃吞吐量和裝卸效率、貨運能力，進而通連和內陸腹地重要城市。亦即海上絲路強調的是港口和港口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港口與腹地的經濟對接，並非只是單純地連接自南中國海至中東、中亞之海上交通線。因此，海上絲路建設的核心是以港口為節點、海上交通線為主線，並且連結腹地界面，以求點、線、面的完善結合。

(二) 戰略目標

基於上述歷史和經濟兩種因素考量，中共將海上絲路戰略定位於：第一，以歷史發展為脈絡，以經略海洋、建設海洋強國為目標，從全球視野擴大對印度洋和亞歐非的開放。第二，以經濟外交、文化交流為手段，在亞歐非地區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繫、融合的人文合作、安全的海上貿易通道，沿線各國相互倚重，拓展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利益發展空間（全毅、汪潔、劉婉婷，2014：4-15）。可見海上絲路的主要戰略目標設定在共同發展中促進共同的繁榮與穩定。中共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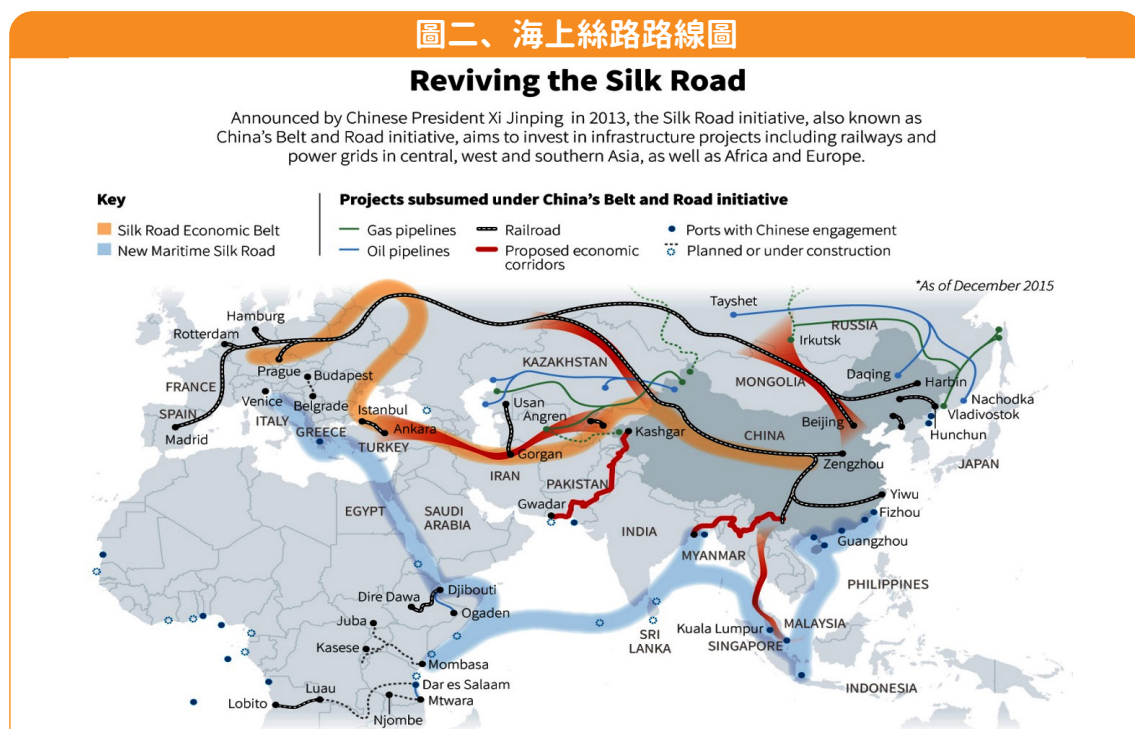
2 「走出去」戰略思想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而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進一步明確，並在2000年3月召開的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將企業「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正式提出，在九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鼓勵國內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開展加工貿易，或者合作開發資源」。

極在沿線國家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聯繫港口往來，進而促進臨港產業、貨物貿易、海洋運輸、資源能源和非傳統安全等領域之雙邊或多邊友好合作關係，確保商業往來暢通安全（趙江林編，2015：30）。

（三）海上戰略支撐點循地緣布局

海上絲路主要有東海啟航線、南海啟航線。包括：從朝鮮半島和中國東部沿海港口進入日本，以及從徐聞、廣州、泉州等南部沿海口岸經東南亞、印度洋進入歐洲和非洲（如圖二所示）（趙江林編，2015：21）。

檢視中共對海上絲路戰略所作評估，南海、北印度洋是攸關發展戰略順利推進之核心區，也是戰略走向的交匯點，關鍵在和該區域國家合作的成敗（孫治國編，2016：137）。亦即從地緣政治角度以觀，中共必須妥慎處理和印度、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國家，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且在南海、北印度洋區域，保持適當且穩定的存在（Chung and Voon, 2017: 421-425）。



資料來源：Asian Trade Centre (2017).

參、解放軍的軍力支撐和海軍部隊現代化建設

藉由上述對海上絲路發展背景的理解，可知此戰略的經濟規模項目龐大，成為中共向印太地區，甚至對世界展現影響力的重要策略。儘管有其共通、共榮願景，惟從實際發展結果而論，卻也被認為是中共推進地緣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於2019年4月公布的報告直指「一帶一路」倡議已造成「侵蝕國家主權」、「缺乏透明度」、「無法持續的債務負擔」、「跳脫當地經濟需求」、「地緣政治風險」、「負面環境影響」、「潛在重大腐敗」七大挑戰（Kliman, Doshi, Lee, and Cooper, 2019: 2）。

叢生的弊端和問題，已令基礎建設投資受援國或利益相關國家愈來愈擔憂「一帶一路」項目的風險。除了取消或是縮小接受投資的規模，中共更同時面對來自包括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和南海周邊國家基於地緣政治經濟權益產生之猜忌疑慮，以及因懸而未決的領土主權爭議而採取各種形式戰略圍堵之外部安全挑戰。另在內部環境因素方面，則是在包括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經濟圈的產業振興後，連帶產生的能源大量進口、商品大規模出口等對外貿易海洋運輸之安全需求（黃家福，2018：45-48）。

因此，隨著中國資本日益融入世界金融體系，對世界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海外利益據點愈來愈多，對於維護海洋經濟、護衛航路安全的期待也就愈來愈高。其中，作為可恃軍力的解放軍海軍，面對局勢更加複雜、嚴峻，不再只是做為一支近岸防禦的軍種，更須建立開關通路和遂行遠洋防衛任務能力（Scott, 2019: 103-105）。

一、強軍興軍戰略要求

在「黨國體制」下，解放軍按照中共「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建軍原則（鄧曉寶編，2014：43），配合「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實質變革進程，力求「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戰略目標（李宣良，2017）。這些自習近平主政後，明確對軍方釋放出的強軍信號，凸顯的是壯大軍事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富強國家的思維理路（于憬之編，2015：40）。因此，在國家富強成為當前中共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內涵，強軍興軍也就成為確保戰略目標實現的能力保障。

海上絲路的戰略布局，象徵中國國家利益拓展的方向和目標，同樣也是軍隊建設的指向和兵力到達的地點（Fanell, 2019: 31）。以 2008 年 12 月，解放軍海軍首次編隊赴索馬利亞執行護航任務為例，前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即言（高曉星、翁賽飛、周德華，2012：147）：

海軍艦艇編隊執行此次護航任務，是我國首次使用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是我軍首次組織海上作戰力量赴海外履行國際人道主義義務；是我海軍首次在遠海保護重要運輸線安全。

可見「利益所至，航跡必達」（李唐、莫小亮，2017），當中國將發展的戰略目標投向世界，解放軍也將隨之轉變為外向型軍隊，且不斷被要求打造和轉型成為滿足發展和安全需求的武裝力量，為國家戰略利益提供有利的戰略支撐。包括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海上戰略通道安全，以及逐漸具備能夠送行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李升泉編，2012：31；陳永康、翟文中，1999：6），成為海軍軍力建設的核心要務。

二、海軍部隊現代化建設

（一）海上力量：海軍作戰部隊

解放軍海軍水面艦艇戰力和功能在近年來快速汰換老舊軍艦，新一代艦艇也陸續完成列裝成軍，戰力愈來愈強。例如：052B、052C 等型自主研發之驅逐艦，以及自俄羅斯引進之 4 艘現代級驅逐艦，已大幅提升防空、反潛、反艦等綜合作戰能力，具備在近海進行海上對抗、封鎖、火力支援等作戰任務（霍克，2011：30）。此外，大量列裝服役之 052D 型驅逐艦，以及已經服役和持續建造

的 055 型萬噸驅逐艦、075 型兩棲攻擊艦，具備更強的海上綜合作戰能力（立文，2017：76-79；Kaushal, 2020；Funaiole and Bermudez Jr., 2020），尤其是其區域防空系統更被視為中國版的神盾戰艦。

解放軍海軍朝向遠洋海軍目標發展，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利益和格局早已超越東亞地區，遍布全球。因此，航空母艦也是遠洋海軍建設的必要之舉。解放軍認為，身處大洋的艦隊必須具有依賴本軍力量獲取制空權和進行區域防空能力。其中，航空母艦等同是移動機場，是在遠海大洋奪取制空權的利器。汲取美英等國發展經驗，中共認為即便建立眾多海外基地，獲得他國支持，海外行動仍然高度倚靠航空母艦上的艦載機，提供空中打擊、戰術掩護，以及控制支援。與此同時，航艦編隊亦是海上綜合作戰平臺，集情報蒐集、兵力投送、火力支援、指揮控制等功能於一體（蔣小平編，2015：190），能全面進行防空、反潛、對岸打擊和對艦攻擊等作戰任務。

隨著中國在現代加油機和新型打擊武器裝備日益完備，航空母艦作戰半徑已獲得進一步擴展。一般認為，大型航艦編隊的艦載攻擊機，應具備對水面和岸上目標的攻擊能力，作戰半徑可達 1,000 海浬；防禦時，對空防禦縱深亦可達 300 海浬，對潛防禦縱深則可達 200 海浬以上。未來，伴隨傳感器技術提升、打擊兵器作戰半徑功能進展，解放軍海軍航空母艦的大平臺效應，將能更加展現。

基此，航空母艦是遠洋艦隊的核心，對建立藍水海軍富有高度的實質意義。中國在大國權力較勁趨勢下，正投入高額資金、人物力等資源發展先進的航艦平臺，期望和其他世界強權一樣，擁有強大的航艦戰鬥群。中共認為海軍軍力發展可以促進亞太區域的勢力更加平衡，穩定地區局勢。這也意味著解放軍海軍軍力的增強，可為國家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為地區和全球安全做出更大貢獻。例如：保護海上交通線、進行海軍外交、執行地區威懾和人道主義援助、災害救援等四大任務未來都將是航空母艦承擔主要功能（O' Rourke, 2021: 16-17）。

（二）空中力量：海軍航空兵

自 1990 年代末期後，解放軍海軍國產新型武器裝備快速發展，一系列具備遠洋作戰能力之新型艦艇一批批地列裝服役。其中，海軍航空兵的裝備性能亦同步大幅提升。在聯合作戰建軍思維下，中共清楚認識到海軍遠洋作戰能力並非由

單一艦種、單一機種、單一兵種所構成，而須從太空到水下，以及包含資訊網路在內的全方位作戰裝備和作戰模式，方能奪取海上綜合控制權。海軍航空兵具有高速機動、突擊猛烈、作戰靈活等特性。在現代海戰中既可鎖定海上目標，亦可對島岸各種目標採取行動，既可遂行突擊、壓制等任務，也能夠遂行反潛、預警、佈雷、空降等多種攻勢戰鬥任務（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19: 73），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當前，解放軍海軍航空兵配賦的主要戰機機型包括：J-10、J-11、J-15、Su-27、Su-30、H-6 等組成的三代機群，作戰半徑達到 1,500 公里以上。過去長久以來，解放軍海軍航空兵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近海海域，亦即提供水面艦艇、潛艇在近海海域執行任務之岸基支援，再加上艦載直升機近距離機動投入，尚能滿足空中力量掩護需求。然而，一旦轉向遠洋，超越岸基航空兵支援範圍，不論是實施對陸打擊、對海攻擊等作戰任務，抑或是遂行偵察、預警、探測等情報支援任務，便凸顯出海軍航空兵戰力空缺，即使遂行遠洋護航、撤僑等非戰爭軍事行動，更反映出裝備不足問題，這也是必須設法填補完善的缺陷。

（三）情監偵力量

1. 情報偵察

目前解放軍海軍的海上偵察力量尚為薄弱，缺乏續航力大和適航性強的綜合偵察船（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部，2014：140-141）。其次，海軍現役艦艇情報獲得主要依靠艦艇本身裝配之雷達、電子偵察設備、光學探測器材等戰術偵察手段，作用距離有限、判情效率不足，尤其難以準確識別複雜環境下的海上快速小目標。第三，是空中偵察手段問題。解放軍海軍在遠洋尚缺乏艦載直升機專用偵察裝備，編隊亦無空中戰役偵察手段，岸基情報體系無法及時提供遠方情報支援，編隊難以直接運用戰略衛星情報，不利於充分掌握任務海域整體態勢等問題尚未解決。第四，是缺乏全球重點和熱點海域情報，對任務海域周邊國家資訊蒐集不足，難以及時更新。第五，儘管「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已覆蓋「一帶一路」國家，2020 年亦具備全球衛星導航、定位、授時功能，有利於水面艦艇、潛艇、戰機、飛彈之精準打擊能力提升，惟作為掌管航天、電子、網路作戰和技術之戰略支援部隊，如何結合海軍對全球大多數海域實施有效監控

之任務需求，其聯合作業機制仍待時間磨合。

2. 通信

是指軍用衛星通信後勤保障能力偏弱的問題。解放軍海軍軍用通信衛星數量少，覆蓋範圍有限，無法確保全球通信品質，而執行打擊海盜任務之亞丁灣海域已達到距離極限，若再航向紅海以外海域，就難以確保通信暢達，這有賴衛星通訊發展提供解決。第二，是水面艦艇、潛艇通信手段有限，無法滿足作戰需要。第三，是海軍單兵特種通信裝備尚待改進。現有特種通信裝備，主要使用解放軍全軍通用之單兵通信裝備，其體積、重量等技術指標難以滿足海上任務使用需求。第四，是涉外通信能力問題。解放軍海軍現役艦艇涉外通信手段少、通信速率低、涉外通信訓練水準不足等問題亦有待提升。

3. 預警探測

是指準確判別各類目標難度大的問題。解放軍海軍現役艦艇雖建立多種觀察預警手段，惟獲取目標直觀資訊手段不足，準確判別各類目標難度大。第二，是欠缺資訊融合，導致解放軍海軍艦艇配賦之指揮資訊系統僅能有效處理軍內訊息往來，無法自動引接氣象、航管、網路自動船位回報系統等外部資訊，只能透過人工手段處理。影響指揮資訊和處理效率。第三，解放軍海軍尚缺乏遠方情報支援，空中預警手段有限，艦艇本身觀察範圍小、判情能力弱，不易掌控任務海域大範圍目標態勢。這是解放軍海軍掌握海域態勢必須精進之處。

4. 航海保障

是指儘管「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之運作可靠性有待持續完善，以及遠洋環境監視能力尚待充實。海上絲路的航線長，解放軍海軍在遠洋執行任務，航經海域必須有準確的海洋地理環境和水文氣象資訊。第三，是海洋環境資訊，以及地理資料匱乏。例如：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航海圖書仍然依賴外文資料，護航區域海流、潮汐、海溫等僅有定性描述，難以做到精確定量分析，影響艦艇專業測量調查以及累積實測資料等等。

上述臚列之解放軍海軍軍力建設的重要取向和不足，皆可顯現在支撐海上絲路戰略上之發展側重重點。中共正運用其國家「軍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國防科技工業發展，以及強化軍兵種聯合訓練作法加以精進和提升

(Bertuca, 2017: 10-11)。從實際發展成果以觀，亦可看出解放軍海軍和相關軍兵種在撐持戰略目標上的企圖依舊強烈。

肆、「海上絲路」戰略利益維護和海上軍力擴張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課題組編，2014：43）國家戰略後，對於此國家戰略利益的主張就被列入政策文件中。例如：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繼續提到「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人民網，2017）；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第33章「積極拓展海洋經濟發展空間」內容中，同樣提及建設海洋強國具體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1）。可見中國已從傳統的陸權型國家向以對外貿易為主體的海權型國家轉型，包括海上絲路在內之「一帶一路」倡議更反映出具體規劃設計（孫國祥，2016：30；李培志，2016：59-65）。以此對應現代海權理論奠基者馬漢認為海權國家具備的要素（冬初陽，2014：28-84），³可見穩定的對外貿易需要安全固定的海上運輸通道；為了確保海上通道的安全順暢，海權國家必須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強大的海軍需要發達的對外貿易獲取的利益來維持這樣的邏輯思維。因此，安全穩定的海上運輸通道以及實現上述目的之強大海軍等要素是海權國家存在的關鍵要素。以「海洋強國」為核心，這正是當前檢視海上絲路和海上軍力擴張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海洋權益維護和戰略競爭

檢視歷史上海洋強國繁榮興盛的國家，其共同點大都未離開利用海洋拓展之對外貿易活動。若以當前中共欲實現的「海洋強國」戰略目標，同樣離不開海洋，以及前述的海外的能源、資源和勞動生產力市場。為了推動經濟發展，確保海外

3 一是以對外貿易為核心的國民經濟體系；二是有強大海軍保障的安全的海上運輸通道；三是有強大海軍為主體的軍事力量、政治和外交力量維持保障的穩定的海外殖民地，或者可作為投資地、能源和資源來源地、市場的地區。

資源、能源基地、產品市場安全穩定，中共將這些攸關海外利益之經營、安全維護等上升至國家戰略層次。其中，海上絲路戰略欲推進和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立戰略支撐點，參與沿線重要港口經營、建設，加強能源資源和產業鏈合作，諸般作為皆和海洋權益直接相關（中國政府網，2016）。

據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的海域面積約 300 餘萬平方公里。以 300 公尺水深為界，淺水區面積約 146 萬平方公里、深水區面積約 154 萬平方公里。其中，南海、東海、黃海和周邊國家爭議區面積達 187 萬平方公里（周守為編，2014：3）。在實施海權戰略的意圖明確之下，必須重視海洋權益。然而，中共向來對外宣稱獲取資源和市場採取的策略並非是攻城掠地式的殖民手段，而國外學者則認為中共主要採用戰略文化影響策略，漸進地改變軍事平衡，塑造有利態勢（Taylor, 2017: 7）。因此，儘管習近平主政後提出新型國際關係（本書編寫組編，2014：138-140）、新型軍事關係（張芳，2016：200），這些以「和平崛起」為根柢的國際關係理念，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楊善民編，2015：9），冀望律定或健全區域雙邊、多邊海上安全合作機制，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之發展新格局，惟不僅難以緩解沿線或周邊國家的戒心，更導致大國戰略競爭態勢愈趨激烈。

首先，從推動海上絲路而論，海上運輸通道的經營和保障海上運輸通道安全是兩大重點，被視為中國海權的「海上生命線」。因此，從南海為起點，是突破第一島鏈走向大洋的第一個出口，其經營尤其重要（Roy, 2017: 16）。中共自 2013 年起積極投入南海填海造島工程，擴建其實際控制的 7 個島礁，並在永暑礁、渚碧礁、美濟礁修建大型機場、港口、燈塔等設施，其目的即在確保南海起點的安全利益（葉長城，2020：72）。此外，在確保海上運輸通道安全暢通方面，中共積極爭取在柬埔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吉布地等國修建港口，作為經貿往來重要樞紐，同時成為解放軍海軍後勤整補基地和軍事基地的機會，並且增加和沿線國家、地區之貿易與合作（胡敏遠，2020：42-44；貝克·馬斯沙·派翠克·德拉米尼，2020：84；江彥賢，2019：75-77），這些舉措皆證明中共重視海洋權益，設法布局沿線戰略要地港口、軍事基地，成為海上通道安全關鍵支撐。

其次，以中美兩國關係為主軸的戰略競爭，更是從貿易、科技領域升級至軍事、法律層次等全方位的較量（Hass, 2021）。以 2021 年 4 月解放軍海軍遼寧艦航艦編隊行經臺灣周邊海域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期間，遭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馬斯廷號」驅逐艦（USS Mustin, DDG-89）在菲律賓外海以近距離目視、拍攝航行相片，以及 5 月份「柯蒂斯魏柏號」（USS Curtis Wilbur, DDG-54）飛彈驅逐艦通過臺灣海峽，駛往南海西沙群島附近引起中共高度關注和不滿，甚至擴大南部戰區海軍「春季大練兵」（孫飛、錢曉虎，2021）實戰化訓練宣傳等情為例，皆印證中共不只是透過海上絲路拓展經貿市場版圖，由此引發的海洋權益和戰略競爭問題，更促使中共加速推進海軍現代化建設。

二、海洋安全治理和軍力擴張

「防務外交」（defense diplomacy）是中共近年來運用解放軍各軍兵種軍力和外國、外軍互動，減少敵意、分歧和誤解的慣用方式（Storey, 2012: 287；徐立特，2018: 36-45）。其中，海軍是國際軍種，具有防務外交功能已是各國共識。海軍跨越海洋，在公海自由航行，其獨特的機動和靈活特性，讓這個軍種能夠成為具有國際外交功能，達成對外政策目標之有利工具。其次，海軍亦是平戰結合的軍種。除了在重大戰略利益海域，以嚇阻為目的之定期或不定期海上巡邏，作為國力向外延伸，對重大安全利益問題表態外，平時無論是涉及氣候變遷、海洋生態保護、海洋污染等和海上氣候與環境相關議題，或是出於安全治理目的，針對風災、震災、海嘯等自然災害的海上馳援活動，以及打擊海盜、反恐、攔截、阻止走私販毒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等等，海軍皆可以人道主義為由，航向任務區域。

第三，基於安全交流合作立場，海軍亦是最能夠實現跨國軍事合作的軍種。例如：海軍援助、海軍艦艇訪問、海上軍事演習、海上聯合搜救、海軍人員交往、海洋科學考察、維和行動等亦顯示在和平時期，海軍具備外交功能的獨特意義。本文認為在支撐海上絲路議題中，中共運用防務外交策略，結合解放軍海軍軍隊建設，將軍力擴張重點置於綜合安全利益的護航行動，以及以此為由建立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支撐點最為重要。

表一、二相關資料顯示，解放軍海軍透過防務外交方式，向全世界展現其活動能力，並且藉此持續強化在相關海域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儘管近年來位於亞丁灣之海盜猖獗活動略微緩解，惟總體而論，包括海上走私、恐怖組織威脅等仍然直接影響中國在海上絲路進行的國際海上貿易活動，尤其是繼之於打擊索馬利亞海盜問題之後出現在孟加拉灣沿岸和東南亞海域的國際海盜行為，更對利益攸關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威脅。

因此，解放軍海軍隨著驅逐艦、護衛艦、綜合補給艦等海上軍武裝備陸續更新強化 (Singh, 2017: 88-89)，以保護本國安全利益、國際人道救助等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為由，再加上海外軍事基地具有兵力駐泊、後勤補給、裝備維護、戰略預警、通信指揮等功用，皆成為解放軍海軍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安全、人道救援、海外撤僑以及搶險救災等境外高階和低度軍事行動必然考量，因而在遠洋的規模、強度將不斷擴大增強。

表一、中共十八大後的海軍重要防務外交活動彙整表

時間	名稱	活動內容
2013年7月5日	海上聯合 - 2013	中國、俄羅斯海軍進行聯合防空、聯合補給、通過潛艇威脅區等 10 餘個科目的演練。
2014年5月20日	海上聯合 - 2014	中國、俄羅斯海軍演練艦艇錨地防禦、聯合對海突擊、聯合反潛、聯合護航、聯合查證識別和聯合防空、聯合解救被劫持船舶、聯合搜救以及海上實際使用武器等科目。
2014年6月26日	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2014	解放軍海軍受美軍太平洋司令部邀請，共同參加演習應付恐怖攻擊、自然災害，以及維護局部區域穩定等各國海軍聯合行動。
2014年4月22日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	解放軍海軍首次承辦第 14 屆年會。

時間	名稱	活動內容
2015 年 5 月 11 日	海上聯合 - 2015	中國、俄羅斯海軍演習的課題是維護遠海航運安全，演習主要內容包括海上防禦、海上補給、護航行動、保證航運安全聯合行動和實際使用武器演練等。
2015 年 5 月 24 日	中新合作 - 2015	中國、新加坡兩國在馬來半島以東海域進行海上雙邊軍事演習。
2015 年 5 月 21 日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	解放軍海軍參加 10 個國家、14 艘艦艇多邊海上聯合演習。
2016 年 9 月 12 日	海上聯合 - 2016	中國、俄羅斯雙方參演艦艇首次以紅藍方「背靠背」方式開展對抗演練，並以聯合立體奪控島礁為特點。
2016 年 6 月 30 日	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2016	解放軍海軍和美軍等多國海軍，聯合演習救災、海上安全合作、制海和複雜作戰等。
2017 年 4 月 23 日	遠航訪問	由長春艦、荊州艦、巢湖艦組成編隊，訪問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緬甸等亞非歐計 20 個國家，航經太平洋、印度洋、紅海、地中海，穿越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等 26 條國際海峽水道，目前是解放軍海軍出訪時間最長（176 天）的活動。
2017 年 7 月 21 日	海上聯合 - 2017	中國、俄羅斯海軍演習聯合防空、聯合登臨檢查、海上搜救、航行補給等科目。
2018 年 10 月 22 日	海上聯演 - 2018	中國和東南亞國協首度舉行海上聯合軍演，聚焦「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使用及聯合搜救、編隊通訊操演等內容。
2019 年 2 月 8 日	和平 -19	中國受巴基斯坦邀請，參加多國海上聯合軍演。包括美國、英國、義大利、澳洲、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土耳其、阿曼等國分別派出艦艇、飛機、特種部隊參加。

時間	名稱	活動內容
2019年4月23日	海軍成立70周年海上閱兵	計有來自61個國家的海軍代表團、13個國家的18艘艦艇赴中國青島參加海上閱兵，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
2019年4月24日	海上聯演-2019	中國和泰國、汶萊、緬甸、菲律賓、新加坡、越南6個國家以「聯合應對海盜威脅和海上應急醫療救援」為課題進行海上實兵聯合演練。
2019年4月28日	東協防長擴大會實兵演習	代表中國海軍參加演習的海軍湘潭艦抵達韓國，和各國參演艦艇在釜山港集結後，進行通信校驗、討論演練細節以及通信組織規定。
2019年10月14日	國際艦隊閱艦式	中國海軍派出「太原」號導彈驅逐艦參加由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辦，包括美國、英國、印度、澳洲、加拿大、新加坡等7個國家海軍共同參與之閱艦式。
2020年1月6日	海洋衛士-2020	依據中國和巴基斯坦兩軍簽訂年度軍事合作計畫，中國海軍以南部戰區海軍兵力為主，派出水面艦艇、艦載直升機和陸戰隊參加聯合軍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表二、解放軍海軍歷次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編隊彙整表

任務編隊	啟航時間	艦艇所屬艦隊	主力任務艦艇
1	2008年12月26日	南海艦隊	海口艦、武漢艦、微山湖艦
2	2009年4月2日	南海艦隊	深圳艦、黃山艦、微山湖艦
3	2009年7月16日	東海艦隊	舟山艦、徐州艦、千島湖艦
4	2009年10月30日	東海艦隊	馬鞍山艦、溫州艦、千島湖艦

任務編隊	啟航時間	艦艇所屬艦隊	主力任務艦艇
5	2010年3月4日	南海艦隊	廣州艦、衡陽艦、微山湖艦
6	2010年6月30日	南海艦隊	昆侖山艦、蘭州艦、微山湖艦
7	2010年11月2日	東海艦隊	舟山艦、徐州艦、千島湖艦
8	2011年2月21日	東海艦隊	馬鞍山艦、溫州艦、千島湖艦
9	2011年7月2日	南海艦隊	武漢艦、玉林艦、青海湖艦
10	2011年11月2日	南海艦隊	海口艦、運城艦、青海湖艦
11	2012年2月27日	北海艦隊	青島艦、煙臺艦、微山湖艦
12	2012年7月3日	東海艦隊	益陽艦、常州艦、千島湖艦
13	2012年11月9日	南海艦隊	衡陽艦、黃山艦、青海湖艦
14	2013年2月16日	北海艦隊	哈爾濱艦、綿陽艦、微山湖艦
15	2013年8月8日	南海艦隊	井岡山艦、衡水艦、太湖艦
16	2013年11月30日	北海艦隊	鹽城艦、洛陽艦、太湖艦
17	2014年3月24日	東海艦隊	長春艦、常州艦、巢湖艦
18	2014年8月1日	南海艦隊	長白山艦、運城艦、巢湖艦
19	2014年12月2日	北海艦隊	濰坊艦、臨沂艦、微山湖艦
20	2015年4月3日	東海艦隊	濟南艦、益陽艦、千島湖艦
21	2015年8月4日	南海艦隊	柳州艦、三亞艦、青海湖艦
22	2015年12月6日	北海艦隊	青島艦、大慶艦、太湖艦
23	2016年4月7日	東海艦隊	湘潭艦、舟山艦、巢湖艦

任務編隊	啟航時間	艦艇所屬艦隊	主力任務艦艇
24	2016年8月10日	北海艦隊	哈爾濱艦、邯鄲艦、東平湖艦
25	2016年12月17日	南海艦隊	衡陽艦、玉林艦、洪湖艦
26	2017年4月1日	東海艦隊	黃岡艦、揚州艦、高郵湖艦
27	2017年8月1日	南海艦隊	海口艦、岳陽艦、青海湖艦
28	2017年12月13日	北海艦隊	鹽城艦、濰坊艦、太湖艦
29	2018年4月4日	東海艦隊	濱州艦、徐州艦、千島湖艦
30	2018年8月6日	北海艦隊	蕪湖艦、邯鄲艦、東平湖艦
31	2018年12月9日	南海艦隊	崑崙山艦、許昌艦、駱馬湖艦
32	2019年4月4日	東海艦隊	西安艦、安陽艦、高郵湖艦
33	2019年8月29日	北海艦隊	西寧艦、濰坊艦、可可西里湖艦
34	2019年12月23日	南海艦隊	銀川艦、運城艦、微山湖艦
35	2020年4月28日	東海艦隊	太原艦、荊州艦、巢湖艦
36	2020年9月3日	北海艦隊	貴陽艦、棗莊艦、東平湖艦
37	2021年1月16日	南海艦隊	長沙艦、玉林艦、洪湖艦
38	2021年5月15日	東海艦隊	南京艦、揚州艦、高郵湖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伍、結論

中共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曾言：海軍應該是國家武裝力量的一個戰略軍種，而不是一個兵種，為了保衛海防，維護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應樹立「縱深防禦」思想，加強遠洋作戰需要的核潛艇、長波臺研製建設工作。由此可見，中共對於解放軍海軍建設有其深遠的戰略思維，只是囿於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發展限制，以及海軍軍力建設並非一蹴可幾，在過去只侷限在近岸防禦方面。然而，當中國的經濟發展遍及全球、隨產業外移後，至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國公民亦開始快速增加，再加上海上絲路戰略愈來愈明確，相關軍力建設漸趨成熟，解放軍海軍已具備確保 21 世紀國家安全與利益、處理國家海洋面臨威脅與挑戰而擴張軍力之充分理由，進而反映在近海防禦、遠海防衛之戰略目標之中。

本文聚焦習近平主政後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和海權擴張問題，其對安全、發展最為關鍵的就是南海和北印度洋。國際關係學者 Robert Kaplan 曾提出：21 世紀地緣政治的戰場是南海，主角只有美國和中國之論點。可見南海的重要性對中國而言，主要因海上絲路之兩條航線全部穿越南海。其中，一條是由中國沿海地區途經南海進入印度洋通往歐洲；另一條則是經由中國沿海地區進入南海通向南太平洋。因此，南海成為中國海上交通線重要通道和地帶的戰略意義不言而喻，也自然和美國海軍「自由航行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主張「無害通過」（innocent passage）的認知多所衝突。此外，掌握北印度洋戰略優勢的意義在於印度洋的戰略地位主要是指印度洋北部邊緣從紅海到麻六甲海峽這一被稱之為「伊斯蘭之弧」（arc of Islam）之弧形地帶，包括了諸多現有的和潛在的衝突區。現代海權理論奠基者馬漢曾言：誰掌握了印度洋，誰就控制了亞洲。對於這個關係著能源航線安全，以及當前各國積極謀求獲得印度洋事務的主導權，已成為中國海上絲路的另一條重要生命線。

由此可見，無論是南海或是北印度洋，對中國而言，都是利用海上絲路謀取發展而必須捍衛的核心利益。基此，解放軍海軍軍力建設至為關鍵。然而檢視軍力發展現況亦可發現解放軍海軍儘管近年來在造艦汰舊換新的速度獲得國家經濟

實力和國防科技工業產業的條件支持，惟在周邊兵力的建置，以及配套之指管通情系統仍有許多限制條件需要逐一克服，方能真正實現在遠洋活動的軍種。惟無論如何，解放軍海軍的建設正緊緊跟隨海上絲路的主軸路徑快速發展。未來，隨著解放軍海軍武器裝備水準不斷精進，包括吉布地等海外軍事基地建設更加完善，甚至擴增其他地點，解放軍海軍執行海外軍事任務的能力勢必大幅度提升。

國際間研究國際關係和戰略安全議題者，多半將「一帶一路」倡議和美國前總統 Donald Trump 提出的印太戰略 (Indo-Pacific Strategy) 內含的安全利益競爭、國家權力較勁、戰略文化衝突，甚至延伸至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之學理爭辯。直至目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 (Joe Biden) 在印太地區仍舊延續和中國激烈地戰略競爭格局。另一方面，由於多國對中國海上絲路之戰略目的產生疑義、對中國以經濟交換對方國的安全、軍事要地更是產生戒心，再加上美國在印太地區保持戰略優勢的立場明確，諸多的戰略互疑因素，無論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或是中共軍事事務的關注，相關議題在短期之內勢將成為各國注目焦點，尤其是外交舉動、軍隊建設，關係著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以及印太地區沿線區域的戰略安全局勢變化，值得持續關注研究。

參考文獻

- Asian Trade Centre (2017). *One Belt, One Road: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Singapore (Part 1)*. <http://www.asiantradecentre.org/talkingtrade//one-belt-one-road-opportunities-and-risks-for-singapore-part-1> (accessed: April 6, 2021).
- Bertuca, Tony (2017). "Pentagon Report: China Sharpens Focus on Military Innovation." *Inside the Navy*, Vol. 30, No. 23, pp. 10-11.
- Cáceres, Sigfrido Burgos (2014).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wer and Resources*. New York: Routledge.
- Cáceres, Sigfrido Burgos and Sophal Ear (2013). *The Hungry Dragon: How China's Quest for Resources is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Chung, Chien-Peng and Thomas J. Voon (2017).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olitical-Economic Calcu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sian Survey*, Vol. 57, No. 3, pp. 416-449.
- Fanell, James E. (2019). "China's Global Naval Strategy and Expanding Force Structure: Pathway to Hegemon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2, No. 1, pp. 10-55.
- Funaiole, Matthew P. and Joseph S. Bermudez Jr. (2020). "China's New Amphibious Assault Ship Sails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new-amphibious-assault-ship-sails-south-china-sea> (accessed: April 6, 2021).
- Hass, Ryan (2021). "How China is Responding to Escalat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s://www.prclleader.org/hass> (accessed: June 10, 2021).
- Kaushal, Sidharth (2020). "The Type 055: A Glimpse into the PLAN'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RUSI Defence Systems*, Vol. 22, No. 1. <https://rusieurope.eu/publication/rusi-defence-systems/type-055-glimpse-plan%E2%80%99s-developmental-trajectory> (accessed: June 10, 2021).

- Kennedy, Conor (2019).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 19, Iss.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trong-points-and-chinese-naval-strategy/> (accessed: April 6, 2021).
- Kliman, Daniel, Rush Doshi, Kristine Lee, and Zack Cooper (2019).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 O'Rourke, Ronald (2021).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RL33153*.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Roy, Nalanda (2017). "The Dragon's Charm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Vol. 30, No. 1/2, pp. 15-28.
- Scott, David (2019). "China'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Problems of Success." *The Journal of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Studies*, Vol. 6, No. 2, pp. 94-113.
- Singh, Leishangthem Bimolchand (2017). "China's Strateg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Vol. 21, No. 1, pp. 80-99.
- Storey, Ian (2012). "China's Bilateral Defens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8, Iss. 3, pp. 287-310.
- Taylor, Shane C. (2017). "Crossover Point: How China's Naval Modernization Could Reverse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dvantage."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No. 1, pp. 1-25.
- 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19).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Washington, D.C.: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2017).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New Means to Transformative Global Governanc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www.cn.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UNDP-CH-GGR%202017.pdf> (accessed: April 6, 2021).
- Wu, Xiangning, You Ji (2020). "The Military Driv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Endeavor:

Expanding the Global Reach from Land Mass to the Maritime Domains." *China Review*, Vol. 20, No. 4, pp. 223-244.

- 人民網（2015）。〈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9/c1024-26765240.html>。
2021/04/06。
- 人民網（2017）。〈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2021/04/06。
- 于憬之編（2015）。《傳統文化中的治國理政智慧》。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編（2004）。《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部（2014）。《全軍軍事科研「十二五」計畫重點課題：軍事信息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中國政府網（201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
2021/04/16。
- 中國網（2019）。〈新聞辦就 2018 年全年進出口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4/content_5357666.htm#allContent。
2021/04/0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t20210323_1270124.html。2021/04/0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新時代的中國國防》。
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
2021/04/06。
- 王浦劬（1995）。《政治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蕾（2018）。《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構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冬初陽（譯），Alfred Thayer Mahan（原著）（2014）。《海權論：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 1783）》。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
- 本書編寫組編（2014）。《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深入學習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立文（2017）。〈中國藍水海軍的希望—055 型驅逐艦〉，《中國經貿導刊》，第 21 期，頁 76-79。
- 全毅、汪潔、劉婉婷（2014）。〈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與建設方略〉，《國際貿易》，第 8 期，2014 年 8 月，頁 4-15。
- 江彥賢（2019）。〈美國說、法國說、中國說，吉布地怎麼說？一帶一路的在地評價〉，《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頁 53-105。
- 何帆、姚枝仲（2013）。《中國對外投資：理論與問題》。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 李升泉編（2012）。《說說國防和軍隊建設新成就》。北京：長征出版社。
- 李宣良（2017）。〈習近平：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 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而奮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26/c_1121862632.htm。2021/04/06。
- 李唐、莫小亮（2017）。〈中國海軍：國家利益所至 艦艇航跡必達〉，《中國軍網》。http://81.cn/big5/hj/2017-04/21/content_7570599.htm。2021/04/06。
- 李培志（2016）。〈從海防到海權—論中國海洋戰略的現代化轉型〉，《新疆師範大學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頁 59-65。
- 汪戎編（2015）。《印度洋地區發展報告 2015：21 世界海商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貝克·馬斯沙·派翠克·德拉米尼（Bheki Mthiza Patrick Dlamini）（2020）。〈北京在非洲的戰略影響：以中共吉布地海軍基地為例〉，《國防雜誌》，第 35 卷，第 3 期，頁 83-136。
- 周守為編（2014）。《中國海洋工程與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海洋能源卷》。北京：海洋出版社。

- 周碧松（2015）。《戰略邊疆—高度關注海洋、太空和網絡空間安全》。北京：長征出版社。
- 胡敏遠（2021）。〈中共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5 卷，第 1 期，頁 37-51。
- 孫昌國（2017）。〈海陸並進，帶路戰略震撼西方〉，《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7000737-260301>。2021/04/06。
- 孫治國編（2016）。《「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報告 2016》。北京：海洋出版社。
- 孫飛、錢曉虎（2021）。〈海軍積極推進練兵備戰提升遠海綜合作戰能力〉，《解放軍報》，版 1。
- 孫國祥（2016）。〈中國南海作為之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頁 29-34。
- 徐立特（2018）。〈新時代中國海軍外交中的戰略文化—以海洋公域活動為例〉，《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頁 36-45。
- 高慶編（2009）。《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訓教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高曉星、翁賽飛、周德華（2012）。《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
- 高蘭（2013）。〈亞太地區海洋合作的博弈互動分析：兼論日美海權同盟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日本學刊》，第 4 期，頁 52-68。
- 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課題組編（2014）。《中國海洋發展報告 2014》。北京：海洋出版社。
- 國務院研究室編寫組（2017）。《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學習問答》。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
- 張芳（2016）。《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張鋒（2017）。《國家戰略：建設「一帶一路」》。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 陳永康、翟文中（1999）。〈中共海軍現代化對亞太安全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7 期，頁 1-25。

- 黃家福（2018）。〈中國海軍走向遠海還缺什麼〉，《領導文萃》，第 10 期，頁 45-48。
- 楊善民編（2015）。《「一帶一路」環球行動報告 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繼國編（2014）。《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原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葉長城（2020）。〈2020 年南海地緣政治情勢、主要國家訴求與其對我國國家安全可能之影響研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72 期，頁 63-87。
- 趙江林編（2015）。《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目標構想、實施基礎與對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劉東民、何帆、張春宇（2016）。《中國海洋金融戰略》。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
- 劉紅霞（2019）。〈超 30 萬億元！我國 2018 年外貿進出口總值創歷史新高〉，《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1/14/c_1210037697.htm。2021/04/06。
- 蔣小平編（2015）。《形勢與政策 2015》。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
- 鄧曉寶編（2014）。《強國之略：國家利益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霍克（2011）。〈中國海軍：現代海上作戰體系（上）〉，《艦載武器》，第 1 期，頁 30-47。

A Study on the PRC's National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Seapower Expansion after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Military Power Construction

Tung, Hui-Ming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and “Strong Military Dream” since Xi Jinping took power. Among them,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trategy proposed on October 3, 2013, includes two important shipping routes from China to the South Pacific and extending to Europe via the Indian Ocean. The impact includes not only coastal ports such as Fuzhou and Sanya but also in terms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regional security,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Europe. In addition to the White Paper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published in July 2019, which requires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val forces to “offshore defense and far-seas operation,” it also highlights the concept of “overseas stakeholder area,” putting forward concrete ideas for safeguarding its overseas interests and ensur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us,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trives to market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trategy to the world,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 Navy are also progressing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counter-attack, maritime maneuvering, maritime joint operations, integrated defense operations, and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apabilities. This combination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economy and military strategy has changed invisibly the CCP's emphasis on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principles of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While the element of "strategic offensive" is rapidly overtaking that of "strategic defense", although the purpose of China's military expansion abroad is not to conquer cities and territories, but to ensure that the paths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re not block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ircraft carrier are no longer fixed at the level of escort. In the future, it will have the function of opening the way as the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 gradually takes shape.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 Navy as the main axis,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power can suppor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us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maritime power of the CCP.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can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PLA's modern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vides another perspective on relevant issue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Maritime Power, PLA Navy, Strategic Strong Point

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模式與特色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toward Taiwan's Young People

趙文志^{**}、許家榛^{***}

Wen-Chih Chao, Chai-Zheng Hsu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8 第七期，頁 55-76。

** 趙文志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 許家榛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的演變與特色為何？本文運用次級資料分析作為研究問題的回應之法，主要梳理中國大陸官員在相關統戰活動所發表的講話內容，以及地方在落實青年統戰過程所出台的相關手冊文件，歸納出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的方式與特點。根據本文研究發現顯示，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上，主要有：增加兩岸交流次數與深度、招收台灣學生赴中求學、延攬台灣青年赴中就業與創業、增辦兩岸青年交流營隊、訂定更加利便的台灣人赴中定居條例，希望透過各種交流後，使台灣青年更加了解中國大陸，進而對中國大陸產生熟悉感與好感，並進而被鑲嵌入中國大陸的體制環境中，以加深民族情感，並完成最終統一目標。中國大陸對台灣年輕人統戰特點有：培養光榮感、讓利與誘因、生根中國大陸以及手段方式的權變，這些均顯示中國大陸統戰工作的靈活性與彈性。

關鍵字：統戰、兩岸關係、青年交流、中國大陸

壹、前言

「二十幾年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少到連『兩岸關係』這個名詞都沒有。演變至今，我們可以說，台灣內外的任何方面幾乎都脫離不了兩岸關係的影響。但在台灣內部，兩岸關係始終是爭議最高、共識最低的政策議題。這個議題分裂了台灣，綁架了政黨，消耗了不知多少政治與社會資源。更糟的是，這態勢看來短期內不會終止。」（蘇起、童振源，2013：序）「兩岸關係」無疑是台灣對外關係與內部發展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議題之一，各個方面都受影響。也因此，由此衍生出許多議題值得進一步探討與分析。

兩岸關係發展無疑是統一、獨立乃至維持現狀間的拉距。對中國大陸來說，統一台灣是其建國以來最重要的「神聖使命」，所有對台政策都是以促進統一為最終目標。其各代領導也提出「同中有異」的對台政策。其中現任領人習近平曾主政福建，被稱為最了解台灣局勢的中國大陸領導人（劉毅，2015），其在中共十九大的會議中，提出了欲實現「統一」的態度和對於「台獨」無法退讓的立場，報告中不斷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查文暉，2017），提出若台灣能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那麼兩岸才能進行開放性的對話，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對台灣來說，目前執政的民進黨卻也不願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做出過多的讓步，在2018年10月10日的國慶典禮總統致詞中，蔡總統再次重申：「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同時表達出台灣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向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立場。」（中華民國總統府，2017）

事實上，過去兩岸關係有其演化過程，從「保密防諜」的時期到「你來我往」的交流（威克，2018），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後的台灣，開始與中國大陸有許多的交流。在兩岸頻繁的交流中，多數被台灣人民關注的都是「政治及經濟」，主要被關注的人則是「政治人物及商人」。然而實際上，兩岸之間的交流還包含相當多種，包括：影視娛樂、宗教、姓氏宗親會、青年交流等等……。

在這些較不被關注的交流中，中國大陸對台灣祭出許多優惠政策，其核心目

的即是希望有助於「統一台灣」工作的推展。不少台灣人民都曾接受過中國的招待，如：「開戶團」、「宗教尋根團」、「廠商策展團」、「台青創業團」、「青年交流團」，其中以「青年學生交流團」為最固定辦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種。

中國大陸對青年統戰工作並非始於太陽花運動之後，從 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就展開對台灣青年統戰工作，這期間經歷不同兩岸外部環境變化，這使得中國對台青年統戰工作產生何種差異？引起本文之主要研究動機，因此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上有何變化？呈現出怎樣的特色？而中國這種對青年「統戰」的政策有何模式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

本文使用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本文試圖透過文獻的梳理，其中包括中國大陸官員在相關統戰活動中之講話紀錄以及地方在落實青年統戰過程中的相關手冊文件，歸納出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的方式與特點。會使用此方式的主要原因在於，透過相關中國大陸作為的文獻整理，可以看出中國官方在對台灣青年統戰的走向與特點。雖然在具體落實上有可能會產生落差，但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模式與特色的梳理，試圖透過文獻的綜整，為中國大陸龐雜的對台灣青年統戰工作勾勒出其可能的完整圖像與規律，補充對於中國大陸統戰工作研究的一塊拼圖，讓吾人對於中國大陸統戰作為有一個更為全面的認知與了解。

貳、相關研究成果探討

一、相關研究文獻探討

對於中國大陸統戰研究的文獻大致可以區分為幾類：

首先是從文化的角度討論中國對台統戰，此類文獻是以台灣盛行的媽祖文化為個案或是直接對於中國文化統戰的方式與策略給予分類，試圖對中國統戰文化手段進行系統性分析，例如古明君分析在國家機關主導下，媽祖文化如何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的文化工具去達成特定的統戰目標，其藉由分析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個案達成其研究結果。此類研究並未針對中共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上的演變

過程與特色特點進行研究，本文將可補足中共對台統戰青年方式為何給予有系統的梳理的空白（古明君，2019：103-133；陳仙妹，2008：60-82）。

第二類文獻則是以香港為個案討論中國大陸在香港所實施的統戰工作進行分析，試圖梳理中國大陸如何籠絡香港人心，其採取哪些統戰方式，例如賴名倫與張廖年仲試圖分析中國大陸在香港統戰方式與目的，而此類研究，亦未去討論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的方式為何？給予系統性整理（盧兆興、洪松勳、盧海馳，2019：25-74；賴名倫、張廖年仲，2019：75-82）。

第三類文獻則是分析中國大陸對台青年統戰工作文獻，此類文獻試圖去耙梳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作為的影響為何？以及單一政策下，制度性作為對台灣青年統戰的效益為何？例如耿曙與曾于蓁就透過問卷與深度訪談試圖去探析台灣青年是否受到影響，而其研究結論發現，中國對台青年統戰對於刻板印象有其改變作用，但對於認同則無法發揮撼動的力量。又如曾于蓁試圖從「青創基地」的制度場域去分析對台統戰的效果為何，其研究發現認為雖然此制度化場域對台灣青年到中國大陸就業有一定效果，但中央與地方欠缺整合協調後續效應需長期觀察。這兩篇文獻主要焦點是了解中國大陸統戰對台灣青年之影響為何，但卻缺乏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與手段演變的時間軸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上有何變化？呈現出怎樣的特色？是目前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文獻較少給予探討，而本文正好可以彌補上述文獻之欠缺之處。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探討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方式與手段之演變，同時歸納出其統戰方式的特徵與特色（耿曙、曾于蓁，2010：29-70；曾于蓁，2018：111-146）。

最後一類文獻則是討論中國大陸統戰本身的內涵，此類文獻試圖透過歷史研究途徑，剖析中共建政以後，其統戰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作用以及不同階段的困境，此類文獻有楊開煌教授為代表（楊開煌，2018：97-135）。此篇文獻試圖從中共統戰會議文件與座談會論文，去檢證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統戰策略應用的差異。

二、中國大陸對統戰的界定

統戰（united front），全稱「統一戰線」，又稱「聯合戰線」。「統戰」施

行於國內，就是國內統一戰線；施行於國外，就是國際統一戰線。「統戰」的概念最初源自於馬克思（Karl 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提出的「共產黨宣言」中的理論，後有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將其闡述為完整理論，再由毛澤東將之發揚光大（金基洞，1981：29-53）。中國的統一戰線主要施行於國內，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給予當時的統戰不一樣的名稱，統一戰線會因時空和條件，而有所變動。

根據 Van Ness、Van Slyke、賴名倫、張廖年仲等人的研究指出，統戰的定義：「運用共同目標與利益作為與非共產黨人士或團體達成構建同盟與合作關係基礎，以達成基本目標」。他們同時指出統戰具有五項特徵，包括：堅持共產黨領導並維持其主動行動能力；二是反映出中國共產黨認知到自身不足，而要爭取非共產黨人士的支持；三是以民族主義和社會改革為主要訴求；四是在保留中國共產黨自主性與最終目標不變前提下，做出表面上讓步；五是統戰工作主要由統戰部負責但不限於單一部門（Van Ness, 1970: 61；Van Slyke, 1967: 121；賴名倫、張廖年仲，20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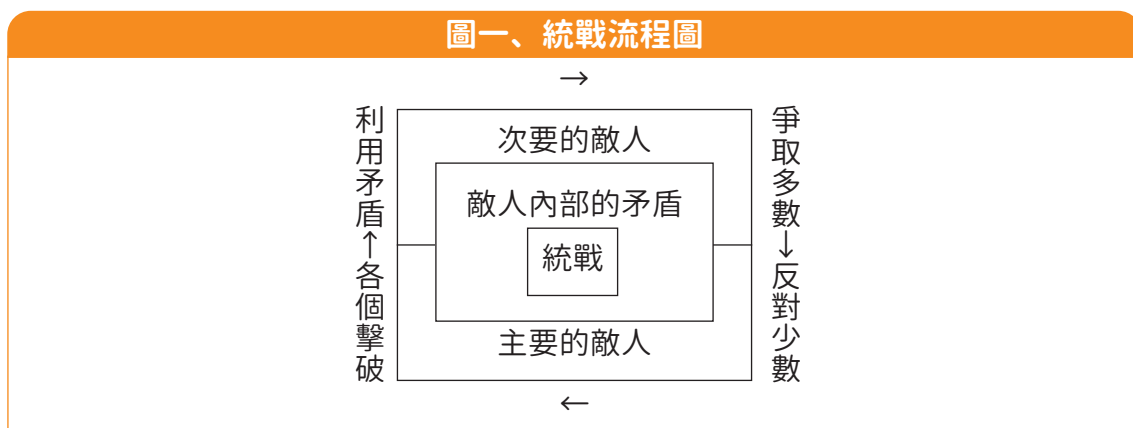
而另外根據楊清海之研究，中共對「統戰」的表述雖然精神一致，但仍有些不同時空背景下，論述上的差異：

如「簡明科學社會主義詞典」中認為統戰是指「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為了反對主要敵人，同其他革命階級、革命政黨和團體以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的聯盟」；而「世界政黨辭典」則將統戰描述為「無產階級與同盟者為反對共同敵人而結成的政治聯盟，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為實現自己的戰略任務，團結本階級各個階層和政治派別，並同一切可以團結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及社會力量，在一定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結成政治聯盟。建立革命的統戰，是無產階級戰略策略的重要內容」；另外，在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手冊」中，將統戰定義為「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為了反對主要敵人或實現一定的戰略任務，同其他國家或其他階級、黨派和社會團體以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的聯盟」（楊清海，1991：10）。

鄧小平在 1979 年的「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

談話中也表明「統一戰線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共同奮鬥，還要促進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共同努力」。綜上所述，統戰的概念基本上就如中國古代張儀的連橫政策，以遠交近攻的方式，將六國分化，再各個擊破，正是「既團結，也鬥爭」的表現。中共的統戰策略亦是先將自己以外的人員分為「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主要敵人」是當前必須攻擊與孤立的對象，而「次要敵人」則廣泛包含未來的敵人、較無威脅性的敵人、盟友。將所有對象區分為主、次二類後，則開始爭取次要敵人之支持與聯手（爭取多數），在與次要敵人聯手時，維持自身的主導性與影響力（反對少數），最後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利用矛盾），將之各個擊破（見圖一）。而這正是 1940 年代，毛澤東在「論政策」中對於「統一戰線」提出的最高原則：「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統一戰線」、「黨的建設」、「武裝鬥爭」被毛澤東稱為中共的三大法寶，沒有「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就不能發展壯大；沒有「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就失去群眾的基礎（金基洞，1981：49）。也因此，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對台灣統戰作為重心從 1990 年代開始，從過去「和平統一」轉變成為「反獨促統」，即是爭取其他團體，共同打擊主要敵人（台獨勢力），其中青年等團體是中共積極爭取的對象（賴名倫、張廖年仲，2019：76）。

圖一、統戰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三、中國統戰的新方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主要重心為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試圖透過統戰去建立政治同盟、孤立中華民國時期的既有利益團體並進一步得以實施社會結構改造工作以落實社會主義。也因此，統戰工作會根據不同時期與狀況需求，將可同盟對象納入統一戰線，讓其進入黨國體制當中。統戰使用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提供政治地位與物質利益的方式進行（賴名倫、張廖年仲，2019：78）。

根據中共於 2015 年 05 月 18 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在條例中，主要的統戰對象為民主黨派人員、無黨派人員、黨外知識份子、少數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留學人員（包含出國與歸國）、港澳人士、台灣人士與其在陸親屬、華僑等幾個族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2015 年 05 月 18 日到 2015 年 05 月 20 日，中國共產黨召開首次中央統戰會議，將過去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升到中央層次（賴名倫、張廖年仲，2019：78）。在這次會議中習近平指出：「不論是在革命、建設或是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戰的工作擺在最重要的位置，集所有努力和力量、資源於統戰的工作上。而如今，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變化越大，統一戰線的發展與工作就越是重要。現在的統戰工作，必須是可以面對「新形勢」的統戰工作」（尤權，2019）。

在此次統戰會議中，習近平特別提到有三個族群是需要重點加強統戰工作的，分別是出國留學者、新媒體時代表人士與非公有經濟人士。首先是出國留學與留學歸國的知識份子，習近平認為統戰的基礎性、戰略性工作就是對黨外知識分子和留學知識份子進行工作。進行對黨外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時，必須增強責任意識、加強工作力量，還要改進工作方法；最重要的是學會與黨外知識分子相處的方法，而這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高本領，引導他們發揮積極作用，也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

其次，習近平認為要加強和改善對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經常性聯繫渠道，加強線上互動、線下溝通，讓他們在淨化網絡空間、弘揚主旋律等

方面展現正能量。

而習近平認為第三種加強統戰工作的對象則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人），習近平在會議中指出，對於這些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統戰工作，必須一面鼓勵支持，一面教育引導，關注他們的思想與困難，利用系統性的方式進行幫助引導，引導他們致富思源，然後富而思進，進而做到愛國、敬業、創新、守法、誠信與貢獻。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對於「統戰」的工作內容與指導方針，呈現出權變的特色，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以及中國大陸民眾知識水平的提升，出國留學人數日益增長，再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從事市場經濟活動的民眾日益增多，中國大陸統戰工作重點也隨著外部環境變化相應做了調整，其主要目的不變，但會根據外部環境演變與外界的情狀作出相對應的調整，希望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與政權穩定性提供強化並做出新的「部署」，引導這些新興力量成為中共執政助力。。

參、中國對台青年統戰之緣起與發展

兩岸關係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雙方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對中國大陸來說，無論領導人如何的更替，對台灣態度強勢或柔軟的變異，其中心思想與最終目標始終是「祖國統一」（張五岳，2013：49-70）。也因此，「統戰」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政府實現「祖國統一」目標的重要手段與工具。中國對台統戰工作的運作面向分成四大類，分別是「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和「文教層面」（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18：185-197）。「政治層面」主要是中國對台灣的外交打壓和軍事恐嚇，如：使台灣與巴拿馬、多明尼加等邦交國斷交、中國軍機、軍艦繞台頻率大幅增加。「經濟層面」則如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後 ECFA 停擺，但中國仍單方面祭出優惠措施，如：號召台灣青年赴中創業、開放台胞職業證照、給予台商土地租稅補貼等……。「社會層面」指確立對台灣的社會和經濟融合，如：以「一代一線」取代原先的「三中一青」。文教層面中，中國大陸試圖以文化和利益相互結合，使台灣青年、師生對中國大陸產生認

同感，具體行動如：舉辦學生冬、夏令營、影視合作、鼓勵台灣師生赴中求學、求職、創業等……，透過種種利益和文化結合方式，使台灣青年對中國產生認同並加強民族意識。也因此，中國大陸目前的對台統戰，基本重點原則仍是「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和「堅決反台獨」，其手法則是軟硬兼施，先以官方表明重點原則後，再給予優惠方案，例如：2018年2月28日，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對台31項措施，吸引了台灣各階層的民眾赴中。然而，此時也一邊加強對「一中原則」的堅持和對「台獨」的絕不忍讓。

從這些統戰作為來看，可以符合中共其統戰的界定與作法。首先、其打擊與防止「台獨」，所以在政治面向上對「台獨勢力」進行鬥爭，因此挖台灣的邦交國，實施軍機繞台，對民進黨政府施壓，這些都屬於對台獨鬥爭的部分；但與此同時，其也積極爭取台灣內部各個團體的支持與認同，對台商、青年人、宗教等其他團體給予經濟上的優惠與情感上的拉攏。

在這些統戰作為下，中國大陸投下龐大資源遂行這樣的工作，例如，光是中國福建省在2020年公告的當年度福建省統戰部預算就高達4,078.9萬人民幣（約18,350萬台幣）（福建省統戰部，2020），而中國總共有26省，由此可知中國對「統戰」的企圖與金錢投入，都相當驚人。

而在統戰工作中，青年是中國大陸近年來工作上的重點，中國對台灣青年的工作目標是「將統戰做到下一代」（黃奕維，2007：70-94）。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始於1993年。初期工作內容主要是增進台灣青年對中國大陸的認識，希望透過教育與交流活動來達成目標，例如1993年中共國台辦在「北京對台幹部培訓班」課程中即強調，「要擴大招收台灣學生，使更多的台灣學生來大陸讀書，這是關係到祖國統一的大事，應從祖國統一大業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把台灣學生請過來，接受大陸的教育，使他們增強對大陸的瞭解，認同祖國統一……」（林昱宏，2008）（中國統戰相關部門與領導人相關講話，請見表一）；又如在1999年的《台灣工作簡訊》中亦提到，「要將台灣的青少年作重點，不斷增加他們對祖國大陸的瞭解……增加民族意識與情感……」（趙成儀，2005：16-19）。可見中國對台灣青年統戰的初始作為主要是「增進、增強台灣青年對中國的了解」進而達到「瞭解祖國」與「民族認同」的目標。

然而，隨著 2000 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內容不再只是就學與交流，由於是第一次由追求台獨的政黨取得台灣執政權，意味著主要敵人「台獨勢力」民進黨不斷坐大，再加上民進黨支持者以「三中一青」居多。因此，強化對年輕人統戰工作成為「統一大業」的重點面向，透過爭取年輕人支持與認同「兩岸統一」目標，使得在打擊台獨勢力上成為多數，讓台獨勢力成為少數，台灣青年人是中國大陸著墨的重點，於是其開始進一步增加「開創事業」以及增加交流深度與長度的統戰內容，例如、2002 年江八點七周年座談會中，時任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即表示，「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兩岸青年應加強交往，增進瞭解。我們歡迎更多的台灣青年來祖國大陸學習深造，開創事業，施展才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2）。此時期的中國對台青年統戰已由認識中國到中國大陸求學發展到「營隊」、「青年創業」的階段，與過去鼓勵台灣青年赴中求學相比，提供更多台灣青年赴中的機會和可能性。又如 2007 年賈慶林在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提及兩岸教育的交流（人民網，2007）表示希望：「積極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全面開展兩岸幼兒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等領域的交流。鼓勵、支持兩岸校際交流與合作，加大互派講學、合作研究、研修學習等多層次專業交流力度，推動雙方在辦學、科研等方面的合作，豐富交流合作的形式與內容。加強兩岸學生交流。在教育領域重視兩岸血脈相連的史實，加強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傳承。大陸方面歡迎台灣大專院校來大陸招生，並為此提供便利。繼續擴大台灣學生在大陸就業的渠道。呼籲台灣方面儘早承認大陸學歷」。

2014 年台灣因與中國大陸要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太陽花學運」後，台灣青年對政治的參與度大幅提高，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擴大許多；再加上台灣青年在政治傾向上日益疏離中國大陸，因此，2014 年後，中國大陸政府也開始進一步強調實際做出「友善台灣青年」的工作，祭出許多為台灣青年「量身打造」的優惠政策，包含「體驗式交流」、「就業機會提升」、「赴中實習」、「廣設台灣青年創業基地」等等……，希望透過赴中發展，改變其對兩岸統一的認知與態度，使得支持統一的聲音與力量成為多數。

2015 年，中共政協主席俞正聲在「2015 年對台工作會議」中曾明確指示要

「擴大兩岸青少年和基層交流，深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吳亞明，2015）。2016年，俞正聲延續並深化了前一年對台工作的目標，他在「2016年對台工作會議」中表示要「擴大深化兩岸文化、教育、旅游、宗教和民間信仰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積極為台灣青年來大陸交流、就學和創業就業創造條件」（彭波，2016）。可見此時期，中國大陸除了原有認識中國、赴中就學外，如何讓台灣青年到中國大陸就業，甚至創業，已成為對台灣青年統戰的另一重點。

表一、中國相關部門有關對台灣青年統戰工作之談話

項次	年份	發言人／單位	內容
1.	1993	中共國台辦	要擴大招收台灣學生，使更多的台灣學生來大陸讀書，這是關係到祖國統一的大事，應從祖國統一大業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把台灣學生請過來，接受大陸的教育，使他們增強對大陸的瞭解，認同祖國統一……。
2.	1995	江澤民	「江澤民：為促進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江澤民提到「十幾年來，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指引下，經海峽兩岸民眾、港澳民眾和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兩岸人員往來以及科技、文化、學術、體育等各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
3.	1999	《台灣工作簡訊》	要將台灣的青少年作重點，不斷增加他們對祖國大陸的瞭解……增加民族意識與情感……。
4.	2002	錢其琛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兩岸青年應加強交往，增進瞭解。我們歡迎更多的台灣青年來祖國大陸學習深造，開創事業，施展才華。
5.	2005	孫亞夫	兩岸青年是中華民族的未來，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生力軍，從某種意義上說決定著兩岸關係的前景，兩岸青年要加強往來，擴大交流，加深感情，累積共識，為構建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搭起一座希望之橋。

項次	年份	發言人／單位	內容
6.	2007	楊毅	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姿態，如湧現一批兩岸交流的品牌項目，如：兩岸青年論壇、海峽兩岸北國風情冬令營、海峽兩岸各民族中秋大聯歡等等。
7.	2008	楊毅	兩岸間各領域交流持續深入發展，一年來，兩岸教育、文化、科技、體育、衛生、影視、出版、少數民族、宗教等各領域的交流都獲得了新的進展，全年共招收台生共 2,200 餘名，全年大約有 8,000 多名台灣大學生來大陸參與交流活動。
8.	2009	范麗青	第五屆兩岸經濟貿易文化論壇將於 7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湖南省長沙市舉辦，論壇首次以文化教育為主題，就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兩岸在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進行探討。……另據瞭解，在論壇期間還將舉辦一場近千人的兩岸青年學生的聯歡活動。
9.	2011	范麗青	第三屆海峽論壇將於 2011 年 6 月 11 日至 17 日在福建主辦……，本屆特色與往屆相比，一是聚焦於基層，特別是台灣中南部民眾；二是將重點辦好公會、青年、婦女、民間信仰、宗親交流……。
10.	2014	習近平	「習近平：擔當起開拓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中提到「兩岸青少年身上寄託著兩岸關係的未來。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些條件，讓他們多來往、多交流，感悟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感悟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趨勢，以後能擔當起開拓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11.	2014	習近平	「習近平：國家統一是我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中「……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特別是要讓更多台灣青年體認到，台灣的命運繫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項次	年份	發言人／單位	內容
12.	2015	俞正聲	擴大兩岸青少年和基層交流，深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
13.	2016	李克強	我們要繼續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促進兩岸文教、科技等領域交流，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年交流。我們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同台灣同胞共擔民族大義，共享發展機遇，攜手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
14.	2019	汪洋	首次參與主辦兩岸基層治理論壇，圍繞《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貫徹落實情況、兩岸青年創業基地發展等調研議政，加強與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人士聯繫，堅定不移反對「台獨」。
15.	2020	吳晶、吳國華、江爾雄	助力兩岸融合發展、推動台灣青年到大陸就業創業、用讀書增進兩岸同胞感情和共識。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2018）。

除了領導人的口頭宣示之外，中國大陸政府更是在官方重要文書中，明白提出針對青年人的統戰規劃，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針對「兩岸青年交流」這種「體驗式交流」有更多規劃，規劃五年內將「深化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擴大兩岸高校學歷互認範圍，推進閩台職業教育交流合作試驗區建設。鼓勵兩岸聯合開展科技研發合作，深化兩岸學術交流，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少年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

2016年後，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主要著重於體驗式交流，並以一代一線和融合發展為主軸，強調要讓兩岸青年合作，且讓台灣青年能在中國扎根。19大後，中國對台的政策主要以一條龍的方式進行，從就學到實習再到就業或創業，更推出居民待遇，讓台灣青年能更加融入中國，藉此重構台灣青年對中國之

認知（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18：191）。

肆、中國大陸對台青年統戰策略與特點

一、中國大陸對台青年統戰策略

90年代初期由於對台工作中，中國大陸顯然認為「台獨勢力」尚未壯大，因此在兩岸青年交流，著重於深度與菁英交流，明確地將對台青年統戰的方式指向「招收台灣學生」，希望透過招收台灣學生赴中國就讀，加深加廣對於台灣學生的影響與體驗，進而達到台灣青年能夠在這種「深度」認識與體驗「祖國」美好事物與人文下，在情感上產生認同，進一步投射在對兩岸關係態度上，能夠支持統一目標。

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對中國大陸來說「當前主要敵人」民進黨成為必須攻擊與孤立的對象，如何爭取「次要敵人」使主要敵人成為少數，就是中國大陸對台統戰新挑戰，因此中國大陸一方面鑑於台灣青年在政治光譜上，普遍較支持民進黨，另一方面，為更有利推動青年統戰，其除了過去透過深度交流方式外，更希望透過提供「未來願景」與發展策略，讓台灣青年能夠在未來人生發展過程中，與中國大陸經濟成就融合在一起。因此，其領導人開始提到歡迎台灣年輕人至中國創業，如2002年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就表示：「我們歡迎更多台灣年輕人來祖國大陸學習深造，開創事業，施展才華」（見上表一），對台灣青年統戰項目擴增至創業與就業，在此時期，開始提供大量機會，讓台灣青年能赴中求學、就業、創業。

2014年是兩岸青年交流的重要轉折年份。2014年3月，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欲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許多台灣民眾的不滿，青年也加入其中，對政府進行抗議而發生「太陽花學運」。此運動在台灣造成相當大的政治影響，而中國大陸方面，也因此進一步正視台灣青年的政治影響力，而加大力度與調整對台灣青年統戰工作。除了原本就業、創業外，中國大陸更進一步採取開放策略，以「國民待遇」原則，讓台灣青年可以在中國大陸就業與生活許多面向上，和中

國大陸民眾享有一樣的權利；同時也開放台灣青年可以參加中國大陸各項專業技術人員考試，例如、醫師資格考試等等。這些作為與政策無非即是要爭取年輕人對中國的認同與對統一的支持，藉以打擊主要敵人「台獨勢力」。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對台灣青年進行統戰的策略世運用眾多名目，包含「文化交流、教育交流、學術交流、青年交流」等，吸引台灣青年去認識中國、進而建立對中國的情感與認同，並隨著外部環境改變，更進一步透過開放與利誘方式，讓台灣青年可以在中國大陸蓬勃經濟發展過程中，在中國大陸政府協助下進行就業與創業，以獲得經濟紅利，進而將自深的發展與未來人生鑲嵌在中國大陸之中，進而有利於對兩岸統一工作目標的達成。除此之外，為了進一步夯實將台灣青年融入中國大陸社會目標，其進一步對台灣青年實施國民待遇，將過去台灣同胞區別對待，調整成為在權利上，享有國民待遇，以期進一步吸引台灣青年到中國大陸生活與發展。而這些作為與策略無外乎是透過「讓利式」深度融合方式，進行統戰工作，希望台灣青年成為兩岸關係的正面支持力量使支持統一成為多數的一方，最終完成兩岸統一目標與工作。

二、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特點

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特點，根據第三節與本節上述內容，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增加光榮感

首先中國大陸對台灣青年統戰特點就是增加台灣青年身為「中國人」的光榮感，藉由認識中國大陸的名勝與大江大海，透過文化體驗，感受到「祖國」深厚的文化底蘊，試圖喚起台灣青年的「中國人」認同，進而增加身為「中國人」的光榮感，以便將此光榮感轉化為對「祖國統一」的支持上。所以在「參訪」行程中，強調文化體認，台灣青年到中國參訪期間，行程中會安排許多台灣青年成長過程中耳熟能詳的景點，不論是清宮劇中常出現的故宮、武俠小說中的光明頂和少林寺、國文課本中的西湖，都會被安排在行程中，強化台灣青年對中國景物的共感。因此文化體認的層面中，中國安排台灣青年以遊歷各省份之名勝古蹟，如：河南-開封府、龍門石窟、少林寺；四川-都江堰、峨眉山；北京-故宮、萬里長城；

安徽-黃山、光明頂;福建-土樓、鼓浪嶼;杭州-西湖等等……,增加文化體認度。

(二) 讓利與誘因

由於中國大陸日益意識到「台灣青年」在兩岸關係發展以及推動「祖國統一」工作上的重要性,中國大陸統戰工作由最早開始「認識中國」,增進為「中國人」的光榮感,在到進一步提供誘因與讓利,讓台灣青年增加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因此,除了「體驗式交流」與「文化體認」以外,中國大陸也祭出許多誘因,包含:青年創業補助、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等……。此類誘因能在一系列文化體任何生活體驗後,加強對於中國欲達到的「台灣青年回歸祖國」之可能性。不僅在文化上加強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同感,也提供真實「回歸祖國生活」的想像和可能。

(三) 生根中國大陸

第三項特點是藉由誘因的提供,讓台灣青年可以在中國大陸發展事業,乃至台灣青年未來在中國大陸成家立業,進而鑲嵌在中國統一工作之中,使其無法離開中國大陸,將台灣青年融合在中國大陸生活之中,成為支持「祖國統一」的重要力量。

(四) 手段方式的權變

中國大陸過去統戰作為,很大程度在參訪行程後,會進一步宣揚其體制的優越性;然而,2014年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後,中國大陸亦反思原先的「青年統戰」手法之失敗原因。因此,2014年後的中國大陸對台青年統戰手法更新,行程規劃上更著重於體驗式交流,減少純粹關於體制的宣揚,這顯示出中國大陸統戰手法權變的一面,會根據情勢發展做適度相應的調整,以達到統戰工作有效落實。

伍、結論

根據本文之研究結果顯示,自1993年中國首次在「北京對台幹部培訓班」的課程中提到要「擴大招收台生」以來,中國大陸方面在對台青年統戰工作一事便不曾停歇或鬆懈。多年來,中國大陸對台青年工作持續因台灣內部形勢與國際情勢做出改變與增強,從原先針對較為菁英的學生,到現在擴大至廣泛的青年(學生、求職青年、創業青年)。雖然募攬對象的條件改變,推出的交流活動也

更廣（從學生到創業）更深（從求學到定居），直接提供台灣年輕民眾赴中交流的機會，但其最終目標仍不離「統一台灣」的初衷。

其對台灣青年統戰，首先是兩岸交流次數增加、深度加乘；透過招收台灣學生赴中求學、延攬台灣青年赴中就業與創業、增辦兩岸青年交流營隊、訂定更加利便的台灣人赴中定居條件，試圖藉由各項優惠措施、交流、論壇與機會吸引和增加台灣年輕人對於中國大陸的好感與熟悉感，希望藉由這些作為可以扭轉台灣年輕人對中國大陸的疏離，重建台灣年輕人對中國之國家認同以及統獨傾向，最終達成「國家統一」。

中國大陸在對台灣青年的統戰過程，仍可對照傳統統戰的架構圖。最終目標是「兩岸統一」。因此，「台獨勢力」成為其打擊的主要對象。希望透過統戰工作將台灣年輕人日益與中國大陸疏離的傾向徹底扭轉，以便打擊「台獨」這個在統一工作上的主要敵人。中國大陸政府若要分化台灣人民與台灣政府，則必需找到雙方相處間的矛盾點。「經濟發展、就業、就學」正是所有青年最為在意的，因此中國在行程中，先以「風景、美食、古蹟、故國情懷」爭取台灣青年的好感，後再以「青年創業基地、就業協助、就學優惠」等方式吸收台灣青年，過程中讓青年確實認同中國之經濟發展較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未來而往中國大陸發展，則中國大陸就達成以「經濟」作為手段，取得年輕人認同。

中國大陸對台灣年輕人統戰特點有：培養光榮感、讓利與誘因、深根中國大陸以及權變的特色。在培養光榮感上，藉由認識中國大陸的名勝與大江大海，透過文化體驗，感受到「祖國」深厚的文化底蘊，試圖喚起台灣青年的「中國人」認同，進而增加身為「中國人」的光榮感；在讓利與誘因上，中國大陸也祭出許多誘因，包含：青年創業補助、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等加強「台灣青年回歸祖國」之可能性；在生根中國大陸上，將台灣青年融合在中國大陸生活之中，成為支持「祖國統一」的重要力量；手段方式的權變上，統戰手法更新，行程規劃上更著重於體驗式交流，減少純粹關於體制的宣揚。這些均顯示中國大陸統戰工作的靈活性與彈性。

面對中國大陸統戰，台灣政府也提出了一些應對作為，包括設立相關青年赴中國大陸所可能面對風險與中國大陸內部相關情勢的資訊平台，藉此讓台灣青年

可以充分認識到在面對中國大陸統戰作為下，其到中國大陸就學、就業乃至深根中國大陸尋求發展時所可能會遭遇到狀況以及如何判斷相關資訊的正確性，讓我國年輕人可以在資訊充分下，做出合宜的判斷，藉此避免承擔相關無謂的成本與風險。

參考文獻

Van Ness, Peter (1970).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an Slyke, Lyman P (1967).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人民網 (2007)。〈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開幕式〉，《人民網》，4月28日。
<http://tw.people.com.cn/BIG5/43949/82547/index.html>。2020/05/23。

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 (2018)。《中國台灣問題 (涉台幹部讀本)》。台北：黃振庭。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20)。〈錢其琛副總理在江澤民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要講話發表七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月28日。<https://www.fmprc.gov.cn/123/wjdt/zyjh/t5150.htm>。2020/01/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5)。〈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 (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9月23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9/23/content_4643975.htm。2020/04/0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3月18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6-03/18/content_4646969.htm。2020/04/01。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7)。〈民國 106 年總統國慶致詞〉，《中華民國總統府》，10月1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662>。2019/12/01。

尤權 (2019)。〈(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 尤權：堅持大

- 統戰工作格局〉，《人民網》，11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1126/c40531-31474052.html>。2020/04/01。
- 古明君（2019）。〈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中國大陸研究》，第62卷，第4期，頁103-133。
- 吳亞明（2015）。〈俞正聲出席2015年對台工作會議並作重要講話〉，《人民網》，1月8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5/0128/c64094-26462090.html>。2020/03/01。
- 林昱宏（2008）。《「太陽花學運」後中共對台灣青年交流的統戰工作之變與不變》。新北市：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18）。《中國大陸綜覽2018年版》。新北市：法務部調查局。
- 金基洞（1981）。《中韓共黨的統戰策略比較研究》。台北市：黎明文化。
- 威克（2018）。〈台灣講古：『那段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日子』〉，《BBC中文網》，1月16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85812>。2019/12/01。
- 查文曄（2017）。〈新華網19大專題報導〉，《新華網》，10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9/c_1121828281.htm。2021/07/13。
- 耿曙、曾于綦（2010）。中共邀訪台灣青年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3期，頁29-70。
- 張五岳（2013）。《中共對台政策之研究》台北：三民。
- 陳仙妹（2008）。〈中共對台文化交流之策略與作法〉，《展望與探索》，第6卷，第10期，頁60-82。
- 彭波（2016）。〈俞正聲出席2016年對台工作會議並作重要講話〉，《人民網》，2月3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0203/c64094-28106193.html>。2020/03/21。
- 曾于綦（2018）。〈統戰的制度場域青創基地與台青的利益連結〉，《國家發展研究》，第18卷，第1期，頁111-146。
- 黃奕維（2007）。〈中國大陸對台青年學生工作成效影響因素分析〉，《展望與

探索》，第 15 卷，第 3 期，頁 70-94。

楊清海（1991）。《中共統一戰線剖析－組織、演變、論證》。台北：龍文出版社。

楊開煌（2018）。〈中共「統戰會議」之分析 - 兼論兩岸學界對統戰之研究〉，
《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2 期，頁 97-135。

福建省統戰部（2020）。2020 年度福建省委統戰部部門預算，<http://www.fjtz.gov.cn/ar/20200221000020.htm>。2020/02/21

趙成儀（2005）。〈現階段中共加強兩岸青年交流之分析〉，《展望與探索》，
第 3 卷，第 10 期，頁 39-53。

劉毅（2015）。〈蔡英文在美國所述對中國政策〉，《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5/6/5/n4450740.htm>。2019/06/05。

盧兆興、洪松勳、盧海馳（2019）。〈中國新統一戰線工作在香港：籠絡人心工程的觀察〉，《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4 期，頁 25-74。

賴名倫、張廖年仲（2019）。〈中共統戰工作的演變：以 1997 年香港回歸前後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4 期，頁 75-82。

蘇起、童振源（2013）。《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台北：五南出版社。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toward Taiwan's Young People

Wen-Chih Chao, Chai-Zheng Hsu

Abstract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 is what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 of Mainland China's united front toward Taiwan's young people are.

This article uses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s a method of responding to research questions, mainly sorting out the content of the speeches made by mainl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relevant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and the relevant manual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youth united fro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finding of way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toward Taiwan's young people are increasing in times and depth of cross strait exchange, recruiting Taiwan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oliciting young people of Taiwan to start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hosting exchange camps of Taiwan and China's young people, and making laws for Taiwanese people to emigrate more easily to China. Second finding is all ways are implemented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better, increasing good impression on China, embedding in Chinese society, and building historical ties to mainland China to reach the goal of unification. Third finding is that all united front works are not only absorbing Taiwanese young intellectuals to study and work after graduation or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in China, but shows the flexibility with time.

Keywords: United Front, Cross-Strait Relations, Young People Exchange, Mainland China

中國因應人口結構轉變之政策分析： 以推動港澳臺居住證為例^{*}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China's Resident Certificate Policy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xample

蔡承翰^{**}

Cheng-Han Tsa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8 第七期，頁 77-95。

^{**} 蔡承翰為東吳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政治人口學 (political demography) 主要在研究人口結構的轉變對政治與經濟面向的影響。在全球逐漸邁入老年化的趨勢中，當國家的人口結構逐漸步入老年化社會 (aging society) 時，國家的經濟生產力 (economic productivity) 就會受到影響，進而使經濟表現衰退。因此國家會採取相應政策來避免國家的經濟產值受到人口結構轉變的衝擊。例如，開放外國勞工、延長退休年齡限制等相關因應措施。

近年來中國在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轉變下，也開始採取相關政策來因應。本文以中國各省的資料來分析，在控制其他變數後發現，當國家的15-64歲工作人口逐漸增加時，對國家經濟產值有正面貢獻。而人力資本愈多也可以促進經濟表現。而撫養比愈高，對各省經濟表現則有負面影響。

同時本文以中國大陸的人口結構轉型為基礎並以此分析中國對臺灣所施行的港澳臺居住證政策對中國與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認為在中國在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轉變下，長期下來，港澳臺居住證政策有利於中國維持人口結構的穩定並維持其經濟發展。

關鍵字：政治人口學、經濟表現、15-64歲工作人口、撫養比、少子化

壹、前言

全球化下，少子化與高齡化是目前世界各國正在面臨的挑戰。學術界也開始以政治人口學（political demography）的角度來看人口規模與結構的變化對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的影響程度。

政治人口學（political demography）是一門研究人口規模（size）、組成份子（composition）、分佈（distribution）與政府和政治的學問（Weinder and Teitebaum, 2001: 11-12）。國家人口結構轉變的影響涵蓋國家內部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選舉、移民政策、財政措施與國家實力等相關面向。例如，根據 Mesquita 等人（2003）的遴選集團理論（selectorate theory），當外來移民在國家某一地區具有一定比例時，候選人的選舉策略必須對特定族群的福利有所應對。同時政府也必須在總體政策層次上對特定族群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期望在下一一次選舉可以獲得他們的選票。

Frey 以種族人口學（racial demography）探討少數族群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影響。Frey 比較 2004 年與 2008 年西班牙裔（Hispanics）、黑人族群（blacks）、亞洲裔（Asians）族群人口數目變化對民主黨與共和黨支持度的變化（Frey 2012: 151-152）。此外 Kauffman 與 Skirbekk 以宗教人口學（religious demography）的觀點來探討不同宗教人口變化對社會內部與家庭型態的影響程度。Kauffman 與 Skirbekk 指出不同宗教人口之間的變化，尤其世俗派與基本教義派之間的衝突，會有文化戰爭的可能性。同時他們也指出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受到傳統宗教教義影響，容易比非宗教女性生育更多小孩而形成大家庭的型態（Kauffman and Skirbekk, 2012: 209）。舉例來說，若世俗派與基本教義派的青年人口規模相當，這樣發生宗教衝突的機率會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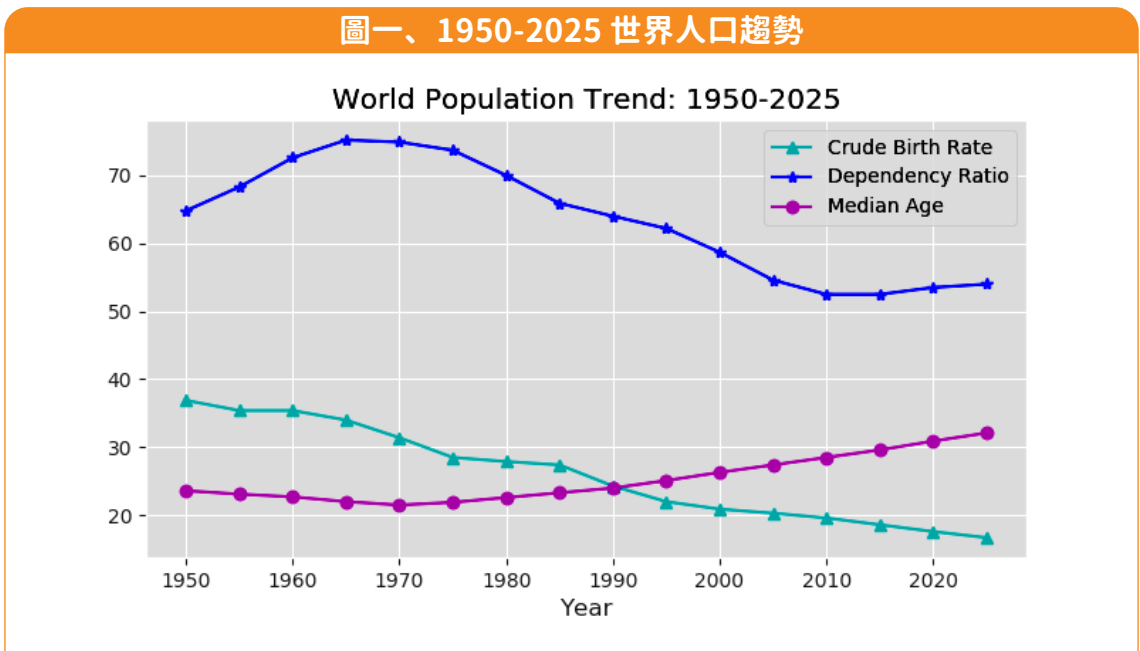
Toft 提出 wombfare 的概念認為高出生率在種族或宗教衝突中是一項有用的政治武器。因為高出生率代表未來會有許多軍事人員，有利於在衝突中擁有優勢並擊敗敵人（Toft, 2012: 214）。

人口結構的變化是政治人口學所關注的重點，藉由人口結構的轉變來探討對

政治與經濟的影響。更進一步地說出生率（birth rate）與死亡率（death rate）在政治人口學中扮演重要角色。Ronald Lee 指出由 1700 年到 2100 年的全球人口轉變趨勢為出生率逐漸降低（2.0%），全球人口總量逐漸增加（9.46 billions）但全球人口增加率逐漸減少（0.04%）。因為科技的進步，人民的生活水準因而提升，且人類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也逐漸拉長到 81 歲（Lee, 2003: 168）。因為全球生活條件水準普遍地提高，全球孩童在五歲前的死亡率逐年下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人數也是逐年地下降；同時人類因為疾病而致死的機率也逐漸減少（Rosling, Rosling, and Rönnlund, 2018: 60-61）。

同時如圖一所顯示，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出 1950 年到 2025 年的全球人口轉變的趨勢為粗出生率逐漸地減少、扶養比提高與年齡中位數增加。

圖一、1950-2025 世界人口趨勢



資料來源：UN DESA

在全球出生率逐漸地減少趨勢下，未來新生兒的數量會逐漸減少，進而影響到未來 15-64 歲工作人口的數量；扶養比率不斷地提高則會使國家的經濟生產（economic productivity）下降，進而影響國家的實力（national power）。

延伸之前的論述，政治人口學研究重點在於生育率（fertility）、死亡率（mortality）與移民（migration）等相關人口變數的變化；同時當人口結構有所變化時，「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將如何影響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層面（Goldstone, 2012:13-14）。本文研究重點在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如何影響國家的經濟表現，而國家在未來高齡化社會的來到時，該如何採取相對應的政策。

本文會利用中國各省的資料驗證當國家的 15-64 歲工作人口數增加時，對國家的經濟表現有正面影響。最後將以政治人口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國港澳臺居住證政策。

本文的文章第二部分為文獻檢閱，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與問題，第四部份為實證結果，第五部分為案例探討，最後則是結論。

貳、文獻檢閱

本文將在此部分探討政治人口學在研究上的應用。人口增加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不同面向的看法。Malthus（1798）認為人口的增加會降低人類的生活水準。原因在於食物生產的速度慢於人口增加的速度，增長的人口無法獲得相對應的食物量，因而增加飢餓引起死亡率增加、戰爭和疾病；同時人口快速地增加會降低薪資並延遲結婚的時間（Lee, 2003: 169）。

人口增加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論點認為人口增加代表未來會有許多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運用在經濟活動上，有利於經濟產值的增加；同時科技的發展會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因此人口增加對經濟發展是助力並非阻力（Bloom, Canning and Sevilla, 2003:15）。Solo（1956）的新古典成長模型指出在模型達到靜態均衡（steady-state）的條件下，經濟產出的成長率等於人口成長率。Peterson（2017）則認為快速人口成長率的低收入國家（low-income countries）在短期與中期下對本身的發展較不利，因為有許多新生兒還在經歷扶養階段；長

期下來，當他們長大成為有生產力的成人（productive adults），就會產生「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¹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

認為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沒有直接關係的中立論者（neutralist）認為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在 Smith（1776）分工原則（the division of labor）下基於每個人之間擁有不同的工作技能而相互形成一個生產的經濟網絡。內生性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則是認為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主因在於知識與智慧的累積，進而促進整體社會的經濟產出（賴景昌，2011：443）。Mankiw，Romer 與 Weil（1992）則是提出當資本設備出現邊際效益遞減時，可以投資人力資本來增進經濟生產；當人力資本出現邊際遞減時，就投資資本設備來促進經濟成長。

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不只可以觀察人口規模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可以探討經濟發展的變化對出生率的影響。過去豐富的實證研究指出個人收入（individual income）愈高的國家，出生率愈低（Thompson, 1929；Notestein, 1945; Camp, 1993; Freedman, 1994; Sinding, Ross, and Rosenfield, 1994）。Feng 等人利用動態 POFED 模型來探討政治與經濟面向的變化對人口規模的影響。他們發現當國家內部的政治愈穩定，出生率愈低；個人收入愈高，出生率愈低（Feng, Kugler, and Zak, 2000: 680-681）。

由人口規模（population size）與國家實力（national power）的途徑來看，因為人口代表未來的勞動力（labor force）與軍事人員（military force）。在假定其政治與經濟相關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規模愈大，國家實力則會增加（Organski and Organski, 1961: 7）。Haas 則指出當國家邁入老年化社會（aging society）時，國家的實力則可能會因此減損。高齡化社會下，老年人口的增加會導致社會福利的財政負擔；同時老年人口的增加會衝擊國家的工作人口（15-64 歲）的比例影響國家經濟生產，進而影響國家實力（Haas, 2012: 55）。另一方面，Haas 進一步指出為了要照顧過多的退休軍事人員，長期下來的財政支出會壓縮到對高階軍事設備的投資對國家實力有負面影響（Haas, 2012: 59）。Sciubba 則

1 人口紅利是指當國家的人口轉型時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 period）出生率與死亡率之間維持最大差距時，就是國家進入人口紅利期間。

是結合人口規模與權力轉移理論來探討國家權力的變化。Sciubba 指出國家的實力是由人口規模 (population size)、生產力 (productivity) 與政治能力 (political capacity) 所構成的 (Sciubba, 2012: 66)。Sciubba 的論點在於在國家進入高齡化社會與工作人口比例減少時，會影響國家的經濟生產力，進而影響國家內部的政治能力；國家的政治能力受到影響後，國家的實力也因此有所變化 (Sciubba, 2012: 66-75)。Lemke 將人口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和國家能力綜合指標 (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 進行最小平方迴歸分析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因為 R² 值約 0.9，因此他主張人口規模的大小可以呈現國家實力的高低 (Lemke, 2008: 779)。

Lemke 更進一步地利用人口規模來測量內戰中交戰團體的軍事實力。他的實證研究指出當一個內戰團體的人口數愈多，代表愈有實力；同時實證結果證明權力轉移理論的論點。國家之間實力差距愈大，國家之間愈不容易發生戰爭。Urdal 則是認為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口 (Youth Bulges) 增加時，同時經濟條件較差時，年輕人容易會更有動機 (motive) 與機會 (opportunity) 參加國內的內戰團體，國家發生內戰的機率會提升 (Urdal, 2012:118-120)。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人口的增加可以提供未來的軍事人員，也因為如此國家發生內戰的機率會增加。在其他相關變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過去的實證研究也顯示當國家人口增加時，國家發生內戰的機率會增加 (Collier and Hoeffler, 1998: 569; Fearon and Laitin, 2003: 84; Collier and Hoeffler, 2004: 573, 576; Cederman and Girardin, 2007: 180; Gleditsch, 2007: 304; Braithwaite, Dasandi, and Hudson, 2014: 58)。

參、研究設計與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國家人口結構的轉變對國家的經濟表現影響為何。當國家進入扶養比高的時期時，國家實力是否會受到影響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因為本文的資料結構為「追蹤資料」 (panel data)，本文採用「固定效果模型」 (fixed-effect model) 來進行實證估計。

因為本文想以從政治人口學的角度來初探港澳臺居住證政策之分析的背後意

涵。因此中國各省的相關資料變數來自於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鑑，時間則是涵蓋 1993 年至 2015 年。

一、依變項

(一) 中國各省的生產總值

本文採用中國各省的生產總值來測量中國各省的經濟表現並作為依變數。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鑑，生產總值包含第一、第二與第三產業的經濟生產，單位是人民幣（億元）。本文將此變數的單位轉換成自然對數單位（natural logarithm）。

二、自變項

(一) 15-64 歲人口數

15-64 歲人口數即是工作人口的比例。15-64 歲人口數比例愈高代表勞動力愈多，可以有更多的「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來促進經濟發展。Bloom and Williamson（1998）的研究就指出東亞地區 20 世紀的經濟發展奇蹟的主因在於工作人口數相較於扶養人口數快速增加，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因此本文預期 15-64 歲工作人口數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單位為自然對數單位（natural logarithm）。

(二) 撫養比（dependency ratio）

撫養比的計算方式為 0-14 歲與 65 歲以上的人口總數除以 15-64 歲的人口數。本文預期中國各省的撫養比愈高，對各省的經濟表現有負面影響。此變數的單位為百分比。

三、控制變項

(一) 受教育人口數

本文以中國各省接受教育的人數來代表各省的人力資本，單位為萬人。接受教育人數愈多，代表人力資本素質高，有利於各省的經濟發展，單位為自然對數單位（natural logarith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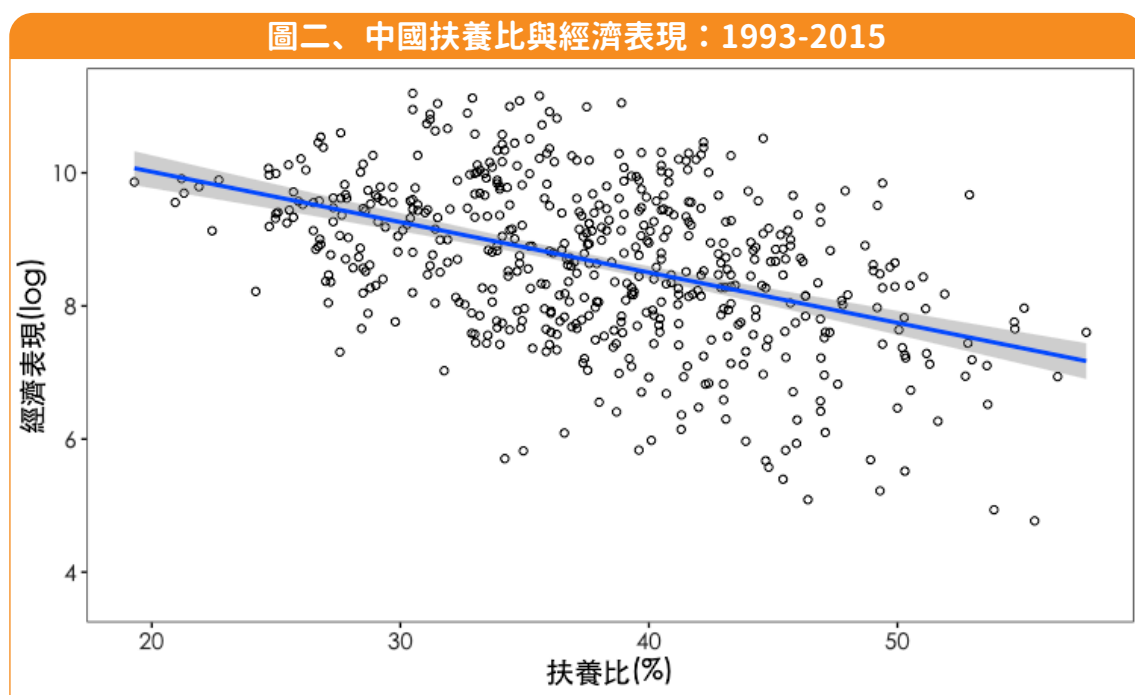
(二) 失業率

本文也在模型中放入中國各省失業率對經濟產值的影響。本文預期失業率愈高，對經濟發展有不利影響，單位則是百分比。

肆、實證分析

在進入實證分析前，本文先採取「探索式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來視覺化中國各省的扶養比與經濟表現之間的關係。

圖二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各省的扶養比愈高，代表 15-64 歲的工作人口數愈少，愈不利於中國各省的經濟表現。接下來表一呈現本文的實證估計結果。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鑑

表一、中國各省估計結果

	經濟表現 (log)
15-64 歲人口數 (log)	0.12(0.02)***
撫養比 (%)	-0.06(0.00)***
受教育人口數 (log)	0.80(0.03)***
失業率 (%)	-0.09(0.03)**
R2	0.82
Adj.R2	0.80
N	461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01, ** p<0.01, * p<0.05)

表一呈現中國相關人口與經濟變數對各省經濟產值表現的估計結果。首先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撫養比的增加對中國各省的經濟產值有負面的影響。當撫養比的人口數增加 1%，中國各省的經濟產值會減少 6%。這樣的實證結果符合本文預期。但這並不代表撫養比中 0-14 歲的人口數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因為長期下來，0-14 歲的人口數在接受完教育進入就業市場後，就會變成勞動工作人口。

15-64 歲的工作人口數則是對經濟發展有正面貢獻。當 15-64 歲的工作人口數增加 1%，中國各省的經濟產值會增加 0.12%。這樣的實證結果也符合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 的研究結果。15-64 歲所代表的人口紅利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重要的推力。

表 1 的估計中，中國各省接受教育的人數愈多代表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利於中國各省經濟產值的增長。當受教育人口數增加 1%，經濟產值會增加 0.80%。表 1 的實證結果也符合內生性成長理論的論點，人力資本的培養有助於經濟發展 (Barro, 1990; 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

在經過中國各省的資料實證估計後，表 1 的估計結果顯示 15-64 歲工作人口的增加對國家的經濟表現確實有正面影響。在全球出生率低、中位數年齡增加與扶養比逐漸增加的浪潮下，國家的經濟成長面臨到人口規模轉變的影響下，如何

維持國家的經濟表現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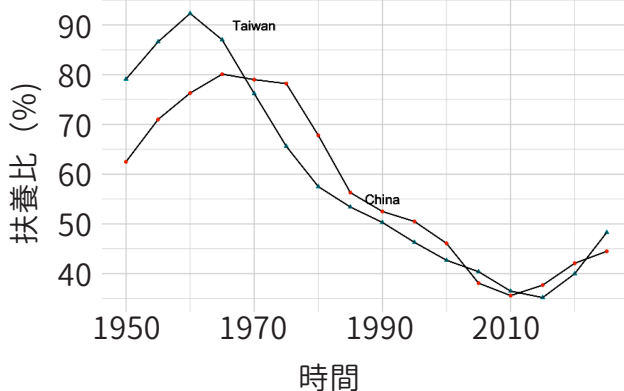
更進一步地說，在少子化與高齡化兩大因素的下，國家維持 15-64 歲人口規模穩定的方法之一為改善國內對國外人民的居住與法規條件，藉此吸引外國移民至本國工作來彌補工作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的趨勢。同時藉由國外優秀的年輕人才來增加國家的經濟生產力，並進而維持國家實力（青年日報，2018）。

本文接下來則是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從人口結構的變化來探討中國的港澳臺居住證政策。

伍、中國港澳臺居住證的分析

本文實證分析部分已驗證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條件下，中國各省的工作人口比例降低會減少各省的經濟生產力。本文圖二也看出中國各省的扶養比對經濟產值有負面影響。圖三為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所做的人口變數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與臺灣的扶養比字 2010 年後逐年地增加。中國與臺灣未來的人口規模將在少子化與扶養比提高的情況下，可以預期工作人口數比例將逐漸減少，中國與臺灣的經濟表現勢必會受到影響。

圖三、1950-2025 中國與臺灣的扶養比趨勢



資料來源：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 DESA）

中國於 2018 年 8 月 16 日宣布在 9 月 1 日對臺灣、香港與澳門正式實行「港澳臺居民居住證」（以下簡稱居住證）來促進臺灣、香港與澳門人民在中國境內的生活便利性。根據國務院所公告的「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² 第 12 條中的敘述，申辦居住證的人民在中國可以享有以下服務：

- (一) 義務教育；
- (二) 基本公共就業服務；
- (三)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 (四) 公共文化體育服務；
- (五)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
- (六)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過去臺灣人民必須申請「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臺胞證）才可以前往中國旅遊。根據王智盛的論點持有臺胞證已經享有一些在中國的生活便利性，例如：在中國銀行開戶、申辦中國手機門號與享用行動支付等措施（王智盛，2018：33）。然而居住證的申請除了第 12 條的基本公共服務外，在第 13 條更詳細地列出持有居住證的人民可以在中國銀行辦理保險金融業務，同時還可以參加中國的就業考試。更進一步地說持有居住證的人民幾乎等同於享有中國公民的基礎服務。

中國的居住證措施提高現居中國的臺灣人民在中國經商、就業與受教育的便利性，同時也提供了新的誘因讓臺灣人民前往中國的就業市場。臺灣政府雖然認為中國居住證政策有所謂將臺灣人民視為中國公民的策略性思考，甚至有促統的戰略意義。因此本文將從政治人口學的觀點來初步探討中國港澳臺居住證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從中國認知作戰的角度來看，中國港澳臺居住證的施行，確實對臺灣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³ 正如 Borjas（1989）就指出若移民成本降低的話，該國的移

2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19/content_5314865.htm。

3 認知作戰的概念可以藉由下列網址有所初步了解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02569&type=%E8%AB%96%E5%A3%87>。

民就會增加。尤其是移入國的環境可以讓外國移民更快地適應移入國的生活環境，例如：語言、工作環境。

正如在中國生活的臺灣人受訪指出，中國港澳臺居住證相較於臺胞證而言，對部分在中國居住的臺灣人確實有便利性。⁴ 不可否認，港澳臺居住證確實可以藉由「同化」（assimilation）讓會增加臺灣人民對中國的認同感。雖然這樣的政策執行不會讓臺灣人完全放棄對臺灣的認同。但藉由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來提升臺灣人（本文指的是中國求學與就業的臺灣人）對中國的認同感，中國港澳臺居住證的發放確實可以有這樣的效果。而本文也發現這也是未來可以持續研究的議題，例如：對有申請港澳臺居住證的臺灣人進行訪談，來探究申請人對於港澳臺居住證的使用想法以及是否對臺灣與中國的認同是否有所改變。

從經濟面向來看，除了港澳臺居住證政策，中國過去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俗稱千人計劃），針對特定專業領域引進優秀人才，並在學歷與年齡條件上有所限制。例如：創新長期青年類年齡不得超過 40 歲。雖然從政治上的考量來看，中國這些政策的施行會讓其他國家有國家機密安全的考量。但以政治人口學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試圖吸引優秀的 15-64 歲的工作人口來因應未來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的來到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本文以為中國的居住證政策在教育、交通、居住、金融與就業等相關方面的便利措施有利於吸引非中國公民移入中國。特別是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語言、文化及飲食等各方面的差距並不大，臺灣人民適應中國環境的時間可以縮短。正如 Mayda（2010）的研究指出在若兩國之間在有共同語言的條件下，距離愈近，若有一國的國內條件有利於移民，則會吸引他國人民移入該國。從人口結構轉變的角度來看，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港澳臺居住證政策可以因應工作人口數逐年下降的趨勢。

在這樣的條件下，從經濟層次來看，中國的居住證政策以政治人口學的觀點來看是在對未來人口結構轉型的因應措施。中國可以藉此吸引臺灣以及港澳地區優秀的年輕人才來維持中國人口結構穩定，也就是維持工作人口比例來避免經濟

4 <https://www.storm.mg/article/504644?page=1>

表現與國家實力衰退。

正如上圖三所顯示，臺灣的扶養比數據也逐年地上升，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的來到，工作人口數相對受到衝擊。臺灣同樣與中國面臨相同的問題，雖然臺灣與中國之間因為歷史的因素導致在國際上無法有正常國與國關係。臺灣政府對臺灣人民申請居住證有一些安全性因應措施，基於國家安全考量這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在面對臺灣人民有更大意願前往中國市場的情況下，如何讓臺灣國內環境變得更有誘因留住臺灣的優秀人才以及吸引其他國外優秀人士願意留在臺灣，例如：改善低薪情況、友善的工作環境等條件。這些都是執政者需要思考的議題。

陸、結論

全球少子化現象導致國家工作人口比例減少的趨勢已無法避免。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規模代表生產力特別是 15-64 歲的工作人口。而生產力可以改善經濟表現。人口結構的變化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本文已驗證 15-64 歲工作人口數的增加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人力資本的培育對經濟發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對 0-14 歲的人口而言，雖然現在對經濟發展無法有正面助益。但長期而言，他們會進入就業市場成為勞動力，因此完善的培育人力資本制度與環境對政府是相當重要的。

通常經濟發展較成熟的國家，出生率與生育率會逐漸降低，漸漸地邁入高齡社會。社會福利所帶來的財政負擔會耗損國家實力。也因此經濟發展高的國家必需思考未來移民政策該如制定並吸引國外移民入籍來維持人口結構的穩定。

本文認為中國的港澳臺居住證政策在中國無法避免少子化與扶養比增加的情形下，對於維持中國未來人口結構的穩定度是有助益的。在中國與臺灣的文化相近的條件下，未來吸引更多臺灣人民前往中國就業與求學是可以預期的情況。雖然中國港澳臺居住證政策剛實施不久，此項政策的施行效果有待商榷。但在扶養比逐漸上升與財政負擔增加的未來，臺灣必需思考如何因應中國港澳臺居住證政長期下來所帶來政治與經濟的影響。

參考文獻

- Barro, Robert 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e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103-125.
- Bloom, David,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 (2003).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 Bloom, David 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8).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3: 419-455.
- Borjas, George J. (1989). "Economic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No. 3: 457-485.
- Braithwaite, Alex, Niheer Dasandi, and David Hudson (2014). "Does Poverty Cause Conflict? Isolating the Causal Origins of the Conflict Trap."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https://doi.org/10.1177/0738894214559673>
- Camp, S.L. 1993. "Population: The Critical Debate." *Foreign Policy*, Vol. 90: 126-144.
- Cederman, Lars-Erik and Luc Girardin (2007). "Beyond Fractionalization: Mapping Ethnicity onto Nationalist Insurgen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1: 173-185.
-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1998).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0, No. 4: 563-573.
-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2004).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4: 563-595.
- Fearon, James D. and David D. Laitin.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75-90.
- Feng, Yi, Jacek Kugler, and Paul J. Zak (2000). "The Politics of Fert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4: 667-693.
- Freedman, L. P. (1994). "Family Planning as an Instrument of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Vol. 20: 31-33.

Frey, William H. (2012). "Racial Demographics and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149-1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2007).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3: 293-309.

Goldstone, Jack A. (2012). "A Theory of Political Demography: Human and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10-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as, Mark L. (2012). "America's Golden Years?: U.S. Security in an Aging World."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49-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uffman, Eric and Vegard Skirbekk (2012). "Go Forth and Multiply: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emography."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194-21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 Ronald (2003).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ree Centuries of Fundament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No. 4: 167-190.

Lemke, Douglas (2008). "Power Politics and Wars without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4: 774-786.

Malthus, T. R.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Edited by Thomas Robert. London: J. Johnson.

- Mankiw, Gregory N., David Romer, and David N. Weil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No. 2: 407-431
- Mayda, Anna Maria (201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Flow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3, No. 4: 1249-1274.
- Mesquita, Bruce Bueno, et al.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MIT Press.
- Notestein, F. W. (1945). "Population: The Long View." In T. W. Schultz (ed.), *Food for the World* (pp. 36-5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rganski, Katherine, and A.F.K. Organski (1961). *Population and World Power*. New York: Knopf.
- Peterson, E. Wesley F. (2017). "The Role of Popul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SAGE Open*, Vol. 7, No. 4: 1-15.
- Rosling, Hans, Ola Rosling, and Anna Rosling Rönnlund (2018).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New York: Flatiron Books.
- Sciubba, Jennifer Dabbs (2012). "A New Framework for Aging and Security: Lessons from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63-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ding, S., J. Ross, and A. Rosenfeld (1994). "Seeking Common Ground: Unmet Need and the Demographic Goals."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Vol. 20: 23-28.
- Smith, Adam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65-94.
- Thompson, W. S. (1929).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4: 959-

975.

Toft, Monica Duffy (2012). "Wombfare: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Fertility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213-2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rdal, Henrik (2012). "Youth Bulges and Violence." In Jack A. Goldstone, Eric Kauffman, and Monica Duffy Toft (eds.), *Political Demography: How Population Changes Are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117-13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iner, Myron and Michael S. Teitelbaum (2001). *Political Demography, Demographic Engineering*.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2018）。〈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的通知〉，08月06日。

王智盛（2018）。〈中國大陸推動「港澳臺居民居住證」政策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10期，頁30-36。

青年日報（2018）。〈少子化藏國安隱憂 多管齊下因應挑戰〉，09月09日。

賴景昌（2011）。《總體經濟學》。台北：雙葉。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China's Resident Certificate Policy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xample

Cheng-Han Tsai

Abstract

Political demography focuses on how population size affects the political-economic field. The increase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will let countries into an aging society; hence, it will harm economic productivity in the long run. To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the aging-population structure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governments adopt relevant policies to face the coming challenge, such as importing foreign laborers and extending retirement ag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dopted specific policies to the coming of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society. In this article,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I apply the data from the provinces of China and figure out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15-64 years old) has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productivity. Besides, human capital positively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rease of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productivity.

Further, I utilize China's Resident Certificate Policy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o analyze how it affects China and Taiwan (R.O.C) from the political demography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this article, to a certain degree, I suggest that China's Resident Certificate Policy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can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the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society. Moreover, it can sus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political demography, low birth r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working-age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協會簡介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成立於 2018 年 6 月，是一個非營利、非官方、獨立於各政黨之外的民間協會。協會創立的宗旨有二：1. 建構國內、兩岸、亞太地區的產、官、學各界合作與對話平台；2. 針對亞洲區域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和平研究與區域整合的學術、調查研究以及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基於促進兩岸與亞洲區域穩定和交流的宗旨，本協會主要的活動包括廣邀產、官、學的專家學者舉辦專題座談與演講；出版電子期刊；承攬產、官、學相關的研究計畫；出版或補助出版相關的專題書籍；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相關議題撰寫主題評析等。

協會創立之會員，主要來自學界（大學教授）、媒體朋友、各級政府文官或幕僚、基層民意代表，以及產業界的朋友。期待創造產、官、學的合作平台，以發揮分進合擊的效果。



我們相信，兩岸與區域的穩定，奠基於多元的交流與信任。而民間的交流是創造共識、建立信任的基礎。在當前國際局勢變化快速、兩岸關係始終難以突破的僵局下，本協會希望能藉由各種交流活動，激發創意和想像，共謀區域與兩岸的穩定和和平。更多關於協會的介紹、研究成果、活動等，歡迎參見協會網站。

協會網址：<https://apeptw.org>

E-mail: apeptw@gmail.com

通訊信箱：40799 台中郵局第 5-120 號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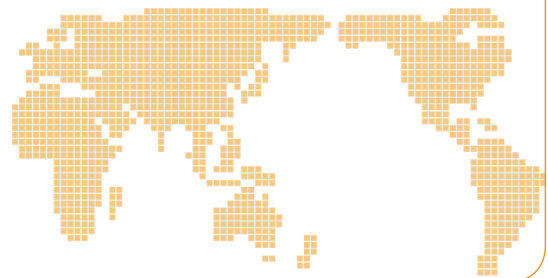
我們也歡迎各界朋友加入協會，或捐款支持協會的活動。入會辦法請參見協會網站。捐款資訊：

郵局（代號 700）帳號：0021057-0379711

戶名：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 沈有忠

徵稿啓事

- 一、本刊是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本刊物旨在研討亞太區域、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尤其歡迎針對當下的各國重要的政經議題、國際與區域的衝突和穩定，提供時事評論或研究論文。
- 二、期刊的出版分為兩個部分：1. 時事評論；2. 研究論文。時事評論配合協會舉辦的座談會，或針對當下重要的政經議題撰寫短文。研究論文則歡迎各界學者專家針對符合期刊宗旨的研究論文投稿。
- 三、期刊出版時間為每年 4、8、12 月；採紙本與電子期刊方式出版。收到稿件後，時事評論部分由編輯委員會邀稿或審查；研究論文由編輯委員會建議審查名單，送學者專家進行審查。通過審查的評論或論文，將致贈當期期刊兩冊，並酌予稿費。



四、本刊物謝絕翻譯作品、禁止一稿多投。本刊有權針對不符合格式、主題，或相關規範之稿件予以直接退稿或要求修訂，再予以審查。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請務必恪遵相關著作權法之規定。撰稿體例請至本刊網站參閱，網址：<https://apeptw.org>。

五、本刊刊登之評析與論文，版權皆歸本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禁止轉載。作者保有著作人格權，可供未來集結出版、教學與研究（非營利）使用。

六、本刊歡迎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來稿。稿件取得雙方同意之文字使用慣例，並簽妥出版同意書後予以出版。稿費依本刊規定換算人民幣後支付。

七、本刊採隨到隨審，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peptw@gmail.com；或將紙本以掛號寄至協會信箱：40799 台中郵局第 5-120 號信箱。本刊收到稿件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受理狀況。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第七期】

發行人：陳文典

主編：沈有忠

副主編：張峻豪

編輯委員：廖達琪、陳佩修、蔡東杰、楊三億、蔡榮祥、陳秋政

執行編輯：林子立

出版年月：2021年08月

定價：單冊新臺幣 300 元，全年三期新臺幣 800 元；

學生憑學生證訂購單冊新臺幣 250 元，全年三期新臺幣 700 元。

出版者：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話：04-23590121

傳真：04-23590256

網址：<https://apeptw.org>

製程管理：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SN: 2664-3650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No.7 August 2021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The 2021 Israel-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Chin-Kuei Tsui

Japan's China Policy Change: A Return to a Lucid Hedging Strategy?

Hung-jen Wang

Dilemma of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The Paradox of Strategic Ambiguity

Lu Hsin Chi

| ARTICLES |

A Study on the PRC's National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Seapower Expansion after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Military Power Construction

Tung, Hui-Ming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toward Taiwan's Young People

Wen-Chih Chao, Chai-Zheng Hsu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China's Resident Certificate Policy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xample

Cheng-Han Tsai

